



塞繆爾·珀切斯著作 《珀切斯和他的遠遊者》中的澳門 (1625)

普伽*

“在我們遠祖的時代，葡萄牙人通過海路找到了通往印度群島的途徑。”

——《珀切斯和他的遠遊者》(Purchas his Pilgrimage)卷1, 頁119

塞繆爾·珀切斯 (Samuel Purchas 約 1577-1626) 是一位歷史學家、牧師⁽¹⁾和遊記作家。他曾任伊斯特伍德地區 (Eastwood) 的牧師 (1604-1614)⁽²⁾。他與聖馬丁地區的牧師路德蓋特 (Ludgate 1614-1626) 一起，出版了幾本《珀切斯和他的遠遊者》或稱《創世紀至今全方位的世界和宗教事務記事》(Relations of the World and the Religions observed in all Ages and places Discovered from the Creation unto this Present) (1613、1614、1617 和 1626 年)。1619 年他的宗教著作《珀切斯和他的遠遊者》，又稱《人類歷史》(the histories of Man) 出版。書中敘述了他生活時代的奇聞異事、人們的墮落和重生以及對聖言的思考。1625 年他發表了其最著名的英文文集《珀切斯和他的遠遊者》，被譯成其它歐洲語言。該書包括了一部世界歷史、英國人和其他國家人的海、陸遊記，堪稱對世界各民族和宗教的調查大全。⁽³⁾其中有一部分是珀切斯在他的導師理查德·哈克路特 (Richard Hakluyt 1552?-1616)⁽⁴⁾ 遺稿的基礎上經過對一些講述者的探險進行評估和修訂編

纂而成的，該書名也因此而來。珀切斯解釋了他如何在沒有得到任何幫助的情況下，把這些材料編輯成為讀者手中的讀物。他說：“在作者表中你們會發現，我從哈克路特大師那裡得到的他多年收集的材料和論文是甚麼。我對他充滿敬意。這些不過是一些資料，我運用自己的寫作技巧將他們編輯成書。”

在英國，收集和翻譯遊記的創始人是理查德·艾登 (Richard Eden)，後來者有哈克路特和珀切斯等人。作為翻譯家，他們的競爭對手不多，除了在他們之前的伊莉莎白·托馬斯·尼古拉斯 (Elizabethans Thomas Nicholas) 和約翰·弗蘭頓 (John Frampton) 之外，再沒有具有商人背景的人成為翻譯家。⁽⁵⁾從葡萄牙人那裡竊取來的葡語信息和其他歐洲人的出版物對歐洲決策者和荷蘭投資人來說至關重要。東印度公司⁽⁶⁾對新發現的國家以及有可能成為未來貿易、海港和合作夥伴的任何描述都認真研究。該公司所做出的任何決定都必須依賴可靠的信息，尤其是那些近期發現的路徑、貿易夥伴和競爭對手的信息。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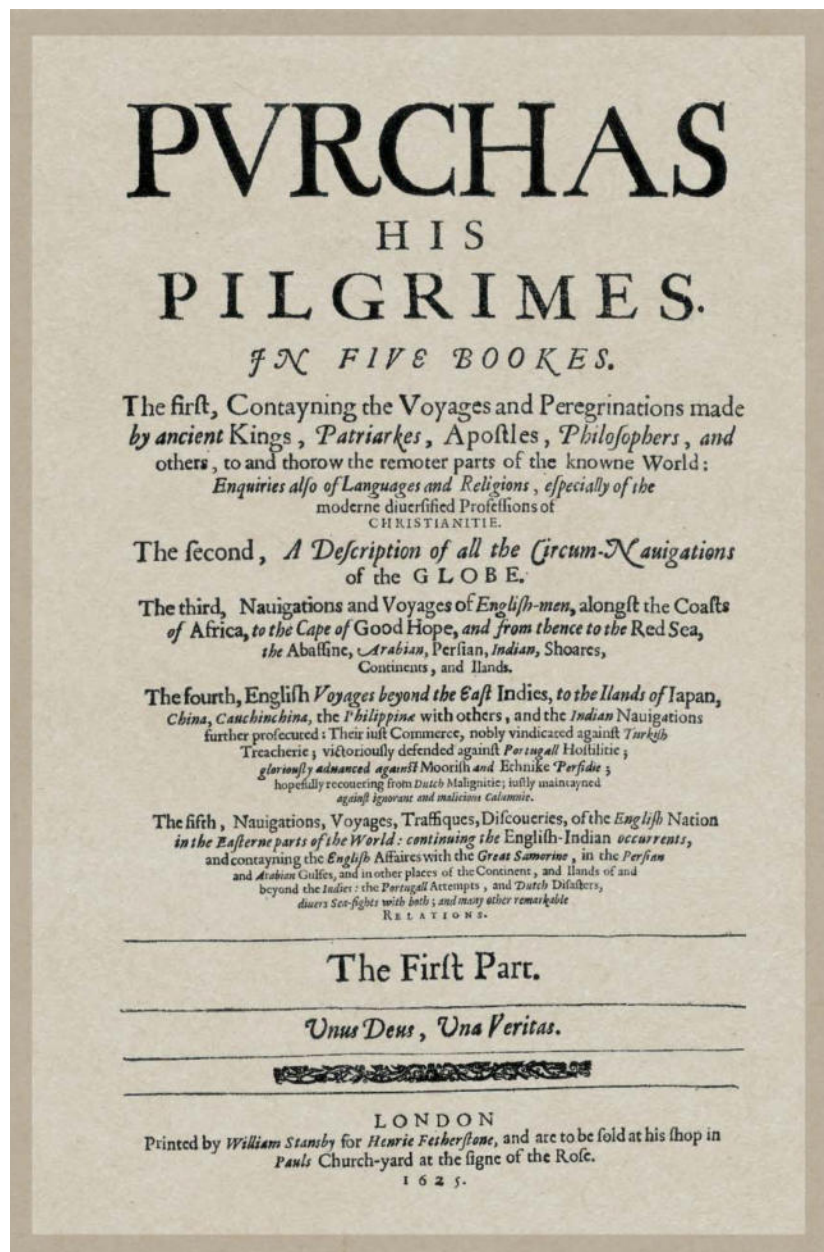
* 普伽 (Rogério Miguel Puga)，英-葡研究哲學博士(新里斯本大學)；澳門大學助理教授；現任新里斯本大學海外歷史中心和里斯本大學比較研究中心研究員。

英國，這些信息多來自葡人的文稿⁽⁷⁾，或者是其他歐洲人針對葡萄牙人在東西印度群島的往來和貿易情況的描述，如賴麥錫憑(Giovanni Ramusio's)的《壯麗的航程》(*Delle Navigazioni et Viaggi* (1550-1559))⁽⁸⁾。

耶穌會士們1582年來到中國。珀切斯對他們來自中國、印度和日本的信函已經很熟悉，有些可以在理查德·威利斯(Richard Willes)所著的《東西印度群島旅行史(1577)》(*The History of Travayle in the West and East Indies* (1577))⁽⁹⁾中看到。珀切斯還閱讀了達米奧·德戈伊斯(Damião de Góis)、巴羅斯(João de Barros)、克魯茲(Gaspar da Cruz)、佩雷拉(Galeote Pereira)、安東尼·加爾沃(António Galvão)、卡斯塔內達(Fernão Lopes de Castanheda)和平托(Fernão Mendes Pinto)等人的記述及其他人的一些文章。根據這些資料，他發表了幾篇在澳門歷史上

很重要的文章，其中最為重要的是關於迭戈·洛佩斯·賽格拉(Diogo Lopes de Sequeira)的遠征族(1508-1510)和阿爾布克爾克(Afonso de Albuquerque)1511年發生的征服馬六甲事件。這兩個事件打開了通往中國的道路。⁽⁹⁾在17世紀，這些數據對於東印度公司來說是非常有用的信息。

這也解釋了為甚麼哈克路特和珀切斯與該機構保持了如此緊密的關係，以及他們所做的工作對做出與英國貿易發展有關決定的重要性。兩位編輯都期待着英國人能夠走向世界，為取得成就，他們出版了與英國貿易⁽¹⁰⁾發展有潛在聯繫的關於遠東⁽¹¹⁾地區的資料。



塞繆爾·珀切斯著作《珀切斯和他的遠遊者》一書封面，1625年。

根據唐納德·拉克(Donald F. Lach)的記述，歐洲人對新近發現的亞洲文化的反應變化無常，有時充滿熱情，有時又很反感，那些遊記作家筆下的描述具有諸如珀切斯等歷史雕琢者⁽¹²⁾經過加工先入為主的深刻烙印，而他所能得到的資料和歐洲資料來源的有限性都影響了他的工作和他對所發表的資料的評價。正如拉克所提到的，葡萄牙的印刷廠試圖包攬官方和非官方的出版物，有單行本，有合訂本。但在1550年賴麥錫(Ramusio)有關航行的巨著開始出版以前，人們手中的資料數量上很少，而且其真實性也無據可查。⁽¹³⁾

到了珀切斯的年代，中世紀的古中國的概念已經定格成了葡萄牙人建立了澳門時期的中國。根據范·克雷(J. van Kley)和福斯(T. N. Foss)的研究，在珀切斯的文集中，他對中國的着墨要比遠東其它地區多，有關中國的資料及時、多樣、詳細，並且有厚重的歷史感。⁽¹⁴⁾這些資料包括門德斯·平托、佩雷拉、加里奧特(Galeote)、門多薩(Mendoza)，以及耶穌會士利瑪竇(Matteo Ricci)、方濟各·沙勿略(Francis Xavier)、安東尼奧·阿爾梅達(António Almeida)、金尼閣(Nicholas Trigault)、龍華民(Niccolo Longobardi)、龐迪我(Diego de Pantoja)和鄂本篤(Bento de Goes)所寫的文章。事實上，雖然珀切斯像當時許多英國人那樣反對天主教皇、反對耶穌會，但是他不得不依賴這些現成的資源，這些文章是以遠東第一個西式大學澳門聖保祿大學為基地的耶穌會士們撰寫的。⁽¹⁵⁾

在關於17世紀英國文學對中國的介紹的著作中，錢鍾書論述了“遠遊者”中使用的四個葡萄牙人對中國的描述，指出珀切斯在《遠遊者》一書中對中國的介紹是英國作者中的首例。⁽¹⁶⁾正如在其它地方提及的，雖然珀切斯出版的一些關於東印度公司的資料並不全面。⁽¹⁷⁾但是，如他前面的哈克路特一樣，他接觸到了來自東印度公司的各類文件，而且扮演了宣傳員的角色。

17世紀初，大多數歐洲人，尤其是英國人，對澳門知之甚少⁽¹⁸⁾，英國人的幾次日本之旅

對此狀況有所改善，哈克路特在他的《航海》(Navigations)一書中也對英國人前往日本的航程有過記述。由於首個英國船隊1635年才來到澳門(該船為倫敦號，是在果阿的葡萄牙人租賃的東印度公司船)，因此，珀切斯發表的任何關於澳門的資料來源都不可能來自英國人。由約翰·威德爾(John Weddell)帶領的首個真正的英國艦隊是1637年到訪澳門的，比《遠遊者》的出版要晚很多。雖然葡萄牙和英國兩國的國王早在14世紀就建立了歐洲最早的聯盟，兩國在亞洲的經貿中依然是競爭對手，葡萄牙人盡可能長時間地將英國人排擠在澳門之外。⁽¹⁹⁾因此在哈克路特著作發表時，英國對澳門幾乎一無所知。但是在珀切斯發表《遠遊者》時，英國人在日本已經站穩腳跟，他們押貨員的日記和通信都對這個葡中飛地有所記述。在威廉·亞當斯(William Adams)的幫助下，東印度公司在平戶建立了商站(1613-1623)，如我們將要看到的，押貨員試圖通過這個商站建立與中國的直接貿易關係，不必通過被葡人極盡全力保衛的澳門。⁽²⁰⁾

珀切斯的主要著作《遠遊者》包括兩個部分，每部分有十卷。第一部分包含了對“老世界”的描述，即地中海、非洲和遠東，中國和日本被劃入“新世界”，因為“古代人對他們一無所知”(卷1: 頁xlvi)。這套文選還更新了許多關於英國與葡萄牙及荷蘭在海外的關係和對抗(“印度航行和英國事務，與葡萄牙和荷蘭的交流；從中可以看出從伊莉莎白女皇時代至今可容忍的規則”卷1: 頁xlv)。第二部分描述了開發西北航道的嘗試⁽²¹⁾、古俄國的遠征、對弗羅里達和西印度群島的探險、英國與西班牙的關係以及對外國探險者在新世界情況的描寫，還有哈克路特著作已經涵蓋的問題。作為哈克路特晚年的助手，這個年輕的遊記文學編纂者繼承了他的導師的航海手稿⁽²²⁾，發表了《遠遊者》，雖然他們的目的一致，都是要收集翻譯和發表那些能光耀英國、證明它在早期海洋中存在，但有些人⁽²³⁾認為珀切斯的著作比他導師的要遜色一些。在他的《書信集》“The

Epistle Dedicatorie”中，珀切斯在寫給威爾士王子查爾斯（Charles, Prince of Wales）的信中說，這本書不但包含了對“分散在世界各地的英國遺產”（卷1：頁xxxvii）的描述，而且也涉及他的王廷在境外的拓展。他還暗示，水手和商人前往未知世界、發現新的領土“能够增加大英帝國和它的繼承者在一個新世界的王權（卷1：頁xxxviii）”。

“您富麗堂皇的王廷給無數的人民和國家帶來歡樂，您接納了來自遙遠國度的野獸、家禽和植物，現在一個更加精彩的世界將加入您的王廷，在那裡，每個朝聖者就代表了這個或那個國家，所有這些都那麼珍稀並五光十色。”（卷1：頁xxxvii-xxxviii）我強調一下，在“獻給讀者”的章節中，他描述了地球上的土地和生物的多樣性：“雖然每個國家都有共通的地方，但也都有自己的奇特之處。”（卷1：頁xl）第一卷引言部分闡述了聖經人物、人類朝聖的生活、基督及其門徒的歷程，還有一些其它的主題。在向讀者介紹歐洲旅行者的日記和報告的摘要以前，編纂者回憶了諸如麥哲倫（Magellan）、哥倫布（Columbus）、德雷克（Drake）和卡文迪什（Cavendish）等人進行的著名航海歷程。與他之前的哈克路特不同，珀切斯已經能够發佈一些關於英國東進的文集了，那時東方還是葡萄牙人和荷蘭人爭奪的商貿區域。在第一卷第六章〈航海贊〉中，他提到了其同胞的探險和需要克服的障礙。他問道：“葡萄牙人在非洲和亞洲獲得了甚麼樣的勇氣的榮譽、國家的增長？把當地人禁閉起來，佔有這些弱小王國的東西，用世界上最賺錢的貿易充實自己，不用顧慮摩爾人、埃及人、土耳其蘇丹們的感受？大海就是車間，航行成為一種磨練，一個女人的堅毅左右着她的臣民的安危。”（卷1：頁53-54）《遠遊者》的引言部分描述了通往俄斐（Ophir）的歷程（卷1：頁83-95）以及羅馬、希臘、馬可波羅（Marco Polo）及其他諸如聖·伊西多爾（Saint Isidore）及其門徒在古代的遠征。珀切斯的目的之一是更正古代作家在“航海和遠距離旅行”（卷1：頁185）中出現的錯誤，如特洛伊·埃涅阿斯（Trojan Aeneas）和其

它神話中的遠征和用哲學方式對知識的探索。他提到了歐洲是發現的中心（卷1：頁244-255）；也提到了葡萄牙作家和探險者巴羅斯（João de Barros）和移居僑外的門德斯·平托，還有哈克路特著作中提到過的其他英國人和歐洲人。這些人不是和葡萄牙人一起前往東方，就是去過他們的領地，這些人也是關於東西印度群島信息的來源（卷1：頁74-75、頁89-93、頁110-112）。在討論印刷和航海這兩個技藝時，珀切斯提醒讀者，歐洲追隨葡萄牙天主教徒⁽²⁴⁾走向海洋。

航海以前被認為是微賤的、野蠻的。但是隨着葡萄牙工業的發展和歷任國王的關注（僱傭天文學家改善條件），航海的地位也得到了提昇，導致了在非洲新的發現，後來又到達了東方。西班牙人樂於步其後塵，進入了新世界（卷1：頁172-173）。因此，在珀切斯的著作中，葡萄牙人是開拓者：對遙遠區域的發現歸功於葡萄牙人，是他們第一個打開了通往世界的窗口，這也導致了西班牙人在新世界的發現（卷1：頁8、頁5）。

首批贏得尊敬的是國王約翰一世（King John I）和作為航海家的亨利王子（Prince Henry），⁽²⁵⁾他們分別是蘭開斯特的菲利帕（Philippa）的丈夫和兒子。菲利帕是岡特約翰（John of Gaunt）的女兒，她1387年與葡萄牙的約翰一世結婚，成為了被稱為“輝煌一代”的航海家亨利（1394-1460）和弗爾南多（D. Fernando, 1402-1433）的母親。⁽²⁶⁾

《書信集》認為珀切斯的著作反映了旅遊、貿易、進步、新世界和異國情調給人們帶來的愉悅，這些因素豐富了大英帝國。這個想法在“獻給讀者（To the Reader）”中依然存在。（卷1：頁xl-xliii）〈俄斐的形勢〉一文記述了歐洲和葡萄牙人的海上行為和幾個遊記故事——尤其是那些有關在印度和勃固（Pegu）所進行的寶石交易，這些交易是由林斯克頓（Jan Huyghen van Linschoten）、拉爾夫·費齊（Ralph Fitch）、意大利的西澤爾·弗雷德里奇（Cesare Frederici）⁽²⁷⁾、加斯帕羅·巴爾比（Gasparo Balbi）、約翰·迪伊（John Dee）、耶穌會士和門德斯·平托達成的，他們在勃固和



中國之間進行交易(卷1: 頁92)。這些參考文獻都支持了俄斐的畢比利卡港(Biblical Port)位於歐洲東邊的看法,而“俄斐商品”的章節除了提到哈克路特(卷1: 頁95-108)已經發表的那些信息以外,還提到了加西亞·奧爾塔(Garcia de Orta)、約翰·夏瑞斯(John Saris)和費齊的文章,珀切斯對他們的看法都進行了更新更正(卷1: 頁119)。最後一節列舉了巴羅斯(João de Barros)和卡斯特羅(João de Castro)(卷1: 頁108-113)的著作《傳道者的光榮(The Glory of the Apostles)》,這些傳道士代表葡萄牙人成為先驅者,把中西方連接在一起。因此俄斐在文集的開始經常出現⁽²⁸⁾,根據卡羅爾·厄尼斯(Carol Urness)所述,珀切斯在《遠遊者》的開篇記述了公元前10世紀所羅門(Solomon)的航程,用以展現英國商貿和航海具有很長的歷史並遠播了神學。⁽²⁹⁾

第二卷主要闡述了環球航海、葡萄牙發現的開端⁽³⁰⁾以及英國和荷蘭兩國在海外的衝突。弗朗西斯·普雷蒂(Francis Pretty)在對由湯姆斯·卡文迪什(Thomas Cavendish)領導的環球航海(1586-1588)的描述中,談到一個叫尼古拉斯·羅德里格(Nicholas Roderigo)的葡萄牙人,他曾經到過中國的廣東和其它地方,也去過日本島,到過蘊藏豐富銀礦的國家,也到過菲律賓。哈克路特發表文章談及此事(卷2: 頁172)。第五章(“奧利弗·努爾特(Oliver Noort)第四次環球旅行,摘自拉丁日記”1598年)描述了努爾特船隊如何在環球航海過程中(1598-1601),在到訪菲律賓以後,登上了一艘往返於馬尼拉和廣東的中國舢板,舢板主人又如何由於與葡人長期進行貿易而精通了葡語。1601年1月,由努爾特率領的疲憊不堪的毛里求斯號(Mauritius)船還遇到了一艘由名叫艾曼紐爾·路易斯(Emanuel Luís)(卷2: 頁203-204)的葡人率領的來自日本的船。這些都表明了會講葡萄牙語多麼有用,也表明盧西塔尼亞人當時在東印度群島已經很具影響力。

英國人很早就探索與中國進行貿易的可能性,這從由本傑明·伍德(Benjamin Wood)率

領的東印度公司第三次航海計劃中就可以看出(1596)。這次航行旨在“深入中國,還攜帶了已故伊莉莎白女王給中國皇帝的友好信件”(卷2: 頁288)。“約翰·戴維斯船長(約1550-1605)的東印度之旅、荷蘭船的領航員等文章均為他自己撰寫”(1600),這些文章列舉了船長本人打算到訪的東印度群島港口,這些港口都在葡萄牙人佔領下,其中包括了著名中華王朝廣東省的澳門城(卷2: 頁305)。

關於亞齊省,文章這樣寫道:“在亞齊省有許多中國人,我與他們有交往,可以向閣下您(埃塞克斯伯爵 Robert, Earl of Essex)提供一些關於這個著名王朝的信息。古薩雷特(Gusarate)的貿易非常充足,葡萄牙人一直小心翼翼地隱瞞着。現在在上帝的幫助下,我們瞭解了情況。”(卷2: 頁306)該文提到了幾個當時很重要的問題,特別是葡萄牙人的戰略沉默政策和商業壟斷以及當地人作為信息提供者的價值,他們可以向英國人提供關於貿易路線和與葡萄牙人的關係,尤其是提供支撐英國在該地區永久貿易發展的信息。大多數英國海員收集並使用關於葡萄牙人與東印度群島當地人交往的信息(卷3: 頁433、442),關於東印度公司第一次航海的記述(由詹姆斯·蘭開斯特(James Lancaster)率領,1600)也提到了中國水手為葡萄牙人工作,成為英國船員的告密者和奸細(卷2: 頁418),是英國人在海上的“得意的敵人”(卷2: 頁541; 卷3: 頁69、89、109、200、348、362; 卷4: 頁380、461、495-501; 卷5: 243-255、256; 卷9: 2-13; 卷10: 頁343-345)。英國人在早期的航海中也從葡萄牙人的知識和經驗中獲益,尤其是在抓獲葡萄牙船隻以後(卷3: 頁253-326)。

威廉·亞當斯(William Adams, 1564-1620)是第一位到訪日本的英國人。⁽³¹⁾他在1611年的兩封信中,對葡萄牙人和耶穌會士在日本的貿易和傳教活動進行了描述,也介紹了“澳門大船”⁽³²⁾的航海情況,“澳門大船”自1571年開始,每年都往返於澳門和長崎之間。這艘船的航海直至1639年所有葡萄牙人都被日本驅逐才結束,它從中獲

取的利潤對澳門這一飛地的經濟來說至關重要。亞當斯寫道：“每過兩三天，都會有個耶穌會士從長崎來找我們，長崎是澳門船每年都要造訪的地方。他們還帶着一些日本人，那些基督徒是我們的翻譯，這些來訪就是噩夢，他們就是我們的天敵。”（卷2：頁332）接着，他還記述了1609年荷蘭兩艘船來到日本，“試圖搶奪每年從澳門來到日本的大船”（卷2：頁338）。⁽³³⁾在給他妻子的信中，亞當斯提到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荷蘭人在遠東的競爭（卷2：頁341-346），約翰·夏瑞思（John Saris, 1607）也曾經描述過荷蘭和葡萄牙在澳門的衝突⁽³⁴⁾（卷3：頁495-498）。在英國人第一次赴日航行（1611-1614）和東印度公司第八次遠征以及“丁香號”（Clove）、“赫克托號”（Hector）和“托馬斯號”（Thomas）的航行過程中，約翰·夏瑞思船長都沿着中國海岸綫行進（卷3：頁478），記述了澳門貿易以及中國的政治形勢，即朝廷禁止了與日本通商，葡萄牙人因此而獲益（卷3：頁448）。1613年，另外一名在日本的英國押運員理查德·考克斯（Richard Cocks）也提到了“索馬斯號”（somas）離開日本前往澳門。（卷3：頁537）⁽³⁵⁾如果真如邁克爾·庫珀（Michael Cooper）所說，亞當斯的船“愛號”（Liefde）終於在1600年4月抵達九州的班哥（Kyushu Bungo），他是第一個到訪日本的英國人，那麼理查德·考克斯就可稱為第二人。他1613年6月與一批英國商人一起乘“丁香（Clove）號”抵達平戶（Hirado），在那裡負責一家英國商站達十年之久⁽³⁶⁾，直到1623年這個機構解散⁽³⁷⁾。從商站的文獻中可以看出，英國人觀察葡萄牙人，從他們在澳門和日本的經驗教訓中汲取有用的東西，試圖從平戶建立與中國的直接貿易聯繫。這從1617年初考克斯發往倫敦的信件中可見一斑：“幫助我們進入中國的船長告訴我們，送給中國皇帝的禮物沒有甚麼比珊瑚樹（currall）更寶貴的了。他們說，多年前在澳門的葡萄牙人送給中國皇帝一個白色珊瑚樹，他如獲至寶。如果不是為了與中國進行貿易的希望，從帕塔尼亞·西姆（Pattania Syam），或如有可能，

從交趾支那得到好處，不會留在日本。”⁽³⁸⁾

那時歐洲在遠東有三個貿易港口：澳門、平戶和長崎（Nagasaki）。新教徒來到日本以及他們的活動使信奉天主教的葡萄牙人的地位岌岌可危。1614年，考克斯告訴同事們，日本天皇下令從日本驅逐所有耶穌會神父（不包括商人）⁽³⁹⁾，他們中一些人逃到了馬尼拉和中國的澳門（Amacau）（卷3：頁551）。他還表示，在日本的中國商人的幫助下，有希望與中國建立直接貿易聯繫。⁽⁴⁰⁾與中國建立直接貿易關係是平戶英國商站的一個主要目標。考克斯還記述了日本使節如何鄙視那些“從澳門乘大船”來的葡萄牙人的禮物並拒絕接見他們（卷3：頁553）。在給班騰（Bantem）的信中，考克斯講述了葡萄牙宗教人士如何被驅逐、他們的教堂如何被摧毀，並在信中的最後說：“葡萄牙人在對待我們國家的到訪者問題上犯了錯誤，然而，我很高興他們能離開，他們有些人去了中國的澳門，其他人去了菲律賓。”⁽⁴¹⁾

在這些文獻中，澳門經常被當做所有天主教神父們的終點站。⁽⁴²⁾在給托馬斯·威爾遜（Thomas Wilson, 1614）的信中，考克斯提到了荷蘭人對中國船的襲擊、葡西兩國在摩鹿加群島（Moluccas）的衝突，葡萄牙人擔心荷蘭人奪取澳門、奧姆茲（Ormuz）、馬六甲和果阿（卷3：頁555），他也提到了荷蘭和英國之間的競爭，雙方為在中國的貿易而戰（卷3：頁556）。1617年，考克斯還描述了西班牙人如何追逐“澳門船”（卷3：頁562-563）、干擾葡萄牙人與中國和日本的貿易。這表明，正像諾昂·保羅·奧利維拉·科斯塔（João Paulo Oliveira e Costa）⁽⁴³⁾所說，1600年新教徒來到日本並很快與德川（Tokugawa）家族打成一片，這使在日本南蠻（nanban）的境況隨之發生了變化。如前所述，理查德·考克斯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建立從平戶直接與中國進行貿易的聯繫，他花了很長時間試圖說服在日本的中國商人幫他，但都沒有結果。⁽⁴⁴⁾如果他成功了，英國人就不必要通過葡萄牙人的“無關緊要的小據點”做事了⁽⁴⁵⁾。據在平戶和長崎的中國社區領

袖、英國商站的客戶之一李譚 (Li Tan) 說⁽⁴⁶⁾，葡萄牙人試圖通過這個“小據點”抵制英國人任何進行貿易的企圖：“在我們進入中國的道路中，祇有澳門(Amacon)的葡萄牙人和馬尼拉的西班牙人，他們與中國有大量的貿易關係，一旦他們知道我們的到來，他們就會阻撓，我們祇有悄悄地進行。”⁽⁴⁷⁾ 考克斯也提到澳門人懼怕見到英國人和荷蘭人的船：“很確定我們可以輕而易舉地奪取葡萄牙佔領的中國澳門，這個城鎮沒有城牆，中國的皇帝也不關心(……)，我們得到的準確情報是，在過去的兩年間，葡萄牙人有兩三次見到我們的船一出現就逃出了城外(……)。如果佔領了這個城鎮，葡萄牙人在這個地區的所有貿易將全部毀掉(……)，中國皇帝也會願意擺脫這個鄰居，幫助我們打入中國貿易的朋友是這樣告訴我們的。”⁽⁴⁸⁾

其它的一些關於東印度群島航行的記述也提到了澳門和中國船隻航行中停靠的地方，如“約翰·戴維斯 (John Davis) 和愛德華·邁克爾伯恩爵士 (Sir Edward Michelborne) 通往東印度群島的第二次航行 (1604, The Second Voyage of John Davis with Sir Edward Michelborne, Knight, into the East-Indies (1604))” (卷2: 頁360-361)，這些地方是後來英國商人的地理參考點。這些英國商人根據原來收集的信息為自己的遠征做準備 (卷3: 頁352)。當英國船員劫掠葡萄牙船隻時，他們盡其所能從俘虜口中和他們的文獻中獲取更多的信息。

《遠遊者》第四卷包括了“英國人到東西印度群島的航海”歷程，講述葡人對英國人和西班牙人的敵意。在1614年東印度公司的航行中，在印度發生了與葡人的戰鬥，接下來他們登上了“天才號”(Gift) 船，審訊了俘虜多明戈·弗朗西斯科 (Domingo Francisco)，他是里斯本人，到訪了“中國的邊境城市澳門，又返回果阿”。這些文獻描述了盧西塔尼亞人向“印度國”(Estado da Índia)⁽⁴⁹⁾ 的遠征，將澳門說成是中國的邊境，是已知和未知兩個世界之間的前沿和連接紐帶⁽⁵⁰⁾、

兩種文明的減壓艙。所有這些從東印度群島獲取的信息被送往英國，為未來使命提供寶貴資料，這從沃爾特·帕頓 (Walter Paton) 撰寫的文獻的題目中的可以看出：“極盡所能收集到的好望角和日本中間地帶葡萄牙人居住並進行貿易的港口、城市 and 鄉鎮簡介。”對“極盡所能”的強調暗示了收集和共享信息的重要性。該作者對當時葡萄牙人在遠東 (即澳門) 的情況進行了這樣的闡述：“中國沿海有一個小島，據說上面有個帶城堡的城市，是與中國人進行貿易的重要地點。他們在日本有商站，但沒有城鎮也沒有貿易站。他們也在中國沿海做貿易，以便能在季風來臨的時候來往日本和其它地方更方便。” (卷4: 頁308) 帕頓在第一句話中使用的動詞“據說”表明這是二手資料，是他在航行中從其他水手那裡得來的，主要描述了該城的防禦系統、財富和在中國的貿易。在日本，葡萄牙人的處境不同，因為他們在那裡沒有像澳門那樣的城市或貿易站，所以他們的壟斷隨着1600年新教徒的到來而終結。

第五卷包含了東印度公司在日本的建立和貿易情況的文獻 (1613-1623)，在《遠遊者》發表的兩年前這些貿易就終結了，因此，落筆於17世紀20年代，珀切斯比哈克路特所掌握的關於日本和澳門的信息要多。他也意識到，由於英國人已經能夠和日本及在日本的中國商人直接接觸，他的著作彌補了他導師著作的不足。“為使讀者滿意和受益” (卷5: 頁303)，第五卷的很多文章都闡述了歐洲人在非洲和日本的利益、冒險和衝突。第一篇文章寫的是在馬丁·普林 (Martin Pring, 1620) 率領下的東印度公司赴東印度群島的航行，文中描述了在日本的反葡萄牙的英荷聯盟“南竿薩克 (Nangasake) 的澳門護衛艦 (……)”的抵達、在中國沿海“麒麟號”(Unicorn) 的損失、對中國船隻的劫掠以及對葡萄牙的戰鬥 (卷5: 頁28、31、40)。文章還告訴讀者，瓦雷拉角 (Cape Varella) 被中國人稱為“煙囪” (卷5: 46頁)。“一封從菲克托斯 (the Factors) 寫給在英國的東印度公司的信 (帕特里克·科普蘭 Patrick Copland,

1619)”描述了“荷蘭人對英國人和中國人的殘忍”、荷蘭對蘭托(Lantore)的入侵、英國對荷蘭的支持、荷蘭人在班達(Banda)進行船隻掠奪以及第一個英國女人在澳門登陸：“‘麒麟號’被稱在中國海岸，在一個叫做馬克約(Macojo [原文如此])的小島附近。船上有兩個英國婦女，所有人都得到了營救：他們的船在岸邊擱淺，大部分貨物都丟失了。”(卷5: 頁146)

第一個到訪澳門的英國商人彼得·芒迪(Peter Mundy)也提到過這個事件。他的日記是第一個用英語對澳門進行描述的書面文體。1637年，在他前往該城的途中，他提到了這兩個女俘虜：瓊(Joan)是木匠理查德·弗洛比舍的妻子，他們的女僕一直留在澳門，與葡萄牙人成婚。⁽⁵¹⁾他們是首次到訪澳門的英國女性，大約在1620年⁽⁵²⁾，“麒麟號”沉入由天主教徒敵人控制的海底，因為此時，葡萄牙人和英國人正在亞洲開戰，戰爭一直到1635年簽訂果阿協定才結束。⁽⁵³⁾

“荷蘭向東印度群島的航行，摘自他們自己的期刊和其它史記”一節證實，那些英國人獲得的關於澳門和葡萄牙其它領土的信息也出自荷蘭的文獻。文章描述了盧西塔尼亞人在東印度群島的存在和利益，同時記述了葡萄牙人和荷蘭人的衝突，⁽⁵⁴⁾即1603年范·西斯科(Van Heemskerck)率領的白獅號(Witte Leeuw)和阿爾克馬爾號(Alkmaar)在柔佛人(Johoreans)的幫助下，劫掠澳門的葡萄牙船的事件(卷5: 頁207-208)。十四噸的“聖塔卡琳娜號”(Santa Catarina)商船，價值三百多萬荷蘭盾，承載七百多男女和兒童，還裝有糖、棉花、麝香等貨物；據伊比利亞人(Iberian)說，那是當時駛離中國的馬力最大、最富有的船。⁽⁵⁵⁾這個事件發生在雅克布·范·西斯科艦隊(Jacob van Heemskerck)第二次向東印度群島航行期間，時間為1603年2月25日凌晨，地點是在新加坡海峽，靠近柔佛河口。當時該船在駛離澳門、前往馬六甲和果阿的途中。這個損失對澳門的商業和經濟是嚴重打擊。⁽⁵⁶⁾據瑪蒂娜·茱莉亞·范·伊特蘇木(Martine Julia

Van Ittersum)說，在荷蘭東印度公司(Ver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董事們的明確要求下，格勞秀斯(Hugo Grotius, 1583-1645)撰寫了“法律訴訟書”(De Jure Praedae)並對該船的捕獲進行辯護。據伊特蘇木說，歷史學家沒有認識到格勞秀斯的自然權利或法律在很大程度上基於范·西斯科自己給出的掠獲商船的理由。格勞秀斯權利理論的重要概念是在缺乏獨立有效的法官的情況下，個人有權懲罰違反自然法律的人。這個概念邏輯上來自范·西斯科給出的對聖塔卡琳娜號進行攻擊的理由，其目的是對葡萄牙人在東印度群島虐待荷蘭人進行報復。⁽⁵⁷⁾

另一則消息也提到雅各布·凡·內克司令(Admiral Jacob Cornelisz Van Neck, 1564-1638)艦隊1600-1603年的航海，說他效力於阿姆斯特丹的“老公司”(Oude Compagnie)。這是荷蘭人赴東印度群島的第四次遠征，是首次前往中國。該消息源還提到當時正在發生的荷蘭與葡萄牙的衝突。由於暴風雨再加上葡萄牙人的活動，船員們1601年到達了澳門，這是他們始料未及的(1601)：“他們覺得離澳門還有12-15里格，又向前走了3-4里格，山腳下的建築已經歷歷在目，還有一些船，每條船裡都有一個男人和女人，還有孩子，似乎很多家庭就住在那裡。他們向這些人(沒人登岸)詢問澳門的情況，人們指着那座山：他們覺得還遠，就讓一些人上了岸，告訴他們晚上看不見了就回來。他們誤判了，後來才發現這就是澳門，但已經太晚了。他們的人被扣留了。看到前方有幾十個小島，船長去勘察探測是不是有安全的海港，但是船長和他的同伴也被從城中出來的船隻攔截了。他們損失了二十個人，包括出納員和船長，他們想寫信求援，又找不到信使，祇好徒勞地在“上川島”(Sanchona) [原文如此] 停留了兩天。10月3日，他們啓程，第二天在塞倫島(Pulo Cynon)擱淺，處於被交趾支那人(Cauchin China)抓住的危險境地。”(卷5: 頁210-211)

葡人早期就為了自己在中國的利益和優越地位與來自馬尼拉⁽⁵⁸⁾的西班牙人交戰，後來又須

面對荷蘭人和英國人。葡人告訴中國當局，那些乘兩艘小船來登陸的荷蘭人是海盜。他們遭到了拘捕，十七人被殺，由雷洛夫茲⁽⁵⁹⁾(Roelof Roeloffsz)撰寫的耶穌會文獻⁽⁶⁰⁾、弗蘭芒旅行家雅克·考特⁽⁶¹⁾(Jacques de Coutre)撰寫的文獻都批評澳門首領，葡萄牙的保羅(Paulo de Portugal)，說他受到了上議院的壓力，致使這些人人頭落地。三、四個荷蘭水手被送到果阿，一個叫阿匹斯(Maarten Uap (Martinus Apius)的水手1604年逃回了荷蘭，向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董事們報告了此事。⁽⁶²⁾這一事件以及伊比利亞人與荷蘭的戰爭導致西斯科和其他船隊的隊長在亞洲對葡萄牙人持敵對態度。1602年荷蘭東印度公司創建後，荷蘭在東印度群島的擴張愈演愈烈，葡萄牙人成為他們最大的障礙，因此發生了多起襲擊葡萄牙領地和船隻的事件。凡·內克在離開澳門後在北大年(Patani)遇到了西斯科，那裡被歐洲商人認為是進入中國市場的必經之路。⁽⁶³⁾荷蘭東印度公司首個艦隊的掌舵人西斯科1601年從阿姆斯特丹啓程，截獲了一艘葡萄牙船，船上帶有來自澳門專員的信，信中說到了葡中兩國聯合對抗荷蘭人以及被澳門抓捕的大多數荷蘭人被殺的事件。(卷5: 頁211-212)

珀切斯發表了關於范·沃維克(Wybrand van Warwijck)(艦隊最高司令官)和沃爾特(Sebalt de Weert)(艦隊副司令)前往東印度群島航行(1602-1604)的譯著，這個航行發生在為了角逐東方貿易，荷蘭進行了公司合併以後。這是荷蘭東印度公司首個派往遠東的艦隊，包括十四艘大船，一艘駁船，有一千多名海員，編成了兩個艦隊。1603年，沃爾特派遣了由韋恩(Cornelis van Veen)率領的一艘駁船和兩艘大船伊拉茲馬斯號(Erasmus)和拿索號(Nassau)的船隊從萬丹(Bantam)前往中國。該消息描述了在1603年6月，這個小型荷蘭艦隊如何輕而易舉地截獲併燒燬了一艘富有的葡萄牙“黑艦”，這艘艦由索薩(Gonçalo Rodrigues de Sousa)率領，裝載了黃金和絲綢，正要從澳門啓程前往長崎。⁽⁶⁴⁾荷蘭人希

望和中國進行直接貿易，僱傭了一名中國船員，把他們帶到廣州：“葡萄牙人逃跑了，留下了一船貨物和二十來個黑人，他們把貨物運上岸，在8月10日放火燒了船，開始向班坦進發。9月18日，他們遇到了一條大船，以為是葡萄牙人，激烈交火逼停船後，發現是中國人，他們對無意中傷害朋友感到難過。”(卷5: 頁216)

第六卷的文獻資料，有些來自葡萄牙人，主要描述非洲之旅。“一個被稱作埃塞俄比亞的地方”，講述了不同民族的生活方式以及他們與歐洲商人的交往(卷6: 頁430、517-543)。這些文獻對人種範圍的描述、對當地動物群體的描述和所刊出的圖片都大大豐富了文獻的編纂。(卷6: 頁400、446-452)

第七卷的信息源和內容也是如此，主要記述了葡萄牙人在非洲的旅行和傳教工作，以及赴“巴勒斯坦、納托利亞(Natolia)和敘利亞”的旅程，也描述了當地人的狀況以及他們和歐洲人的交往。

第八卷包括“通往巴勒斯坦、納托利亞和敘利亞歷程；古今英國及其他人，從陸路前往亞述、亞美尼亞、波斯[安東尼·雪萊爵士(Sir Anthony Sherley)]、印度[紐柏萊(John Newberry)]、阿拉伯半島以及亞洲其它內陸國家的遊歷”。

在第九卷，我們發現了來自紐柏萊和拉瓦爾(Francois Pyrard de Laval)從“東方國度”發來的信件和記述，以及用葡萄牙語寫成了“印度國”(Estado da Índia)。這篇文章簡要提到了澳門的貿易、法律和管理(卷9: 頁148、154、160)，這些對英國商人都是寶貴信息。

第十卷包含了歐洲人對發現東西印度群島的記述，尤其是以前出版物忽略的巴西，即：由幾個耶穌會士、加爾沃(António Galvão)、哈齊(Arthur Hatch)、考克斯(Robert Cocks)(在中國和日本進行貿易)、威尼斯商人弗雷德里奇(Cesare Frederici)、珠寶商巴爾比(Gasparo Balbi)(前往了聖托馬斯，內加帕坦(Negapatam)勃固)、舍利爵士(Sir Robert Sherley)、考亞特(Thomas

Coryate)、布朗 (Arnold Brown)、費齊 (Ralph Fitch)、皮門塔 (Nicolas Pimenta) 到訪印度和林斯柯頓 (Linschoten) 的耶穌會士等人的記述。

珀切斯還發表了幾篇關於英國人佔據奧姆茲的報告和文獻 (卷10: 頁329、342)。該卷的第一章 (“西班牙和葡萄牙航海簡集, 摘自加爾瓦諾斯 (Antoine Galvanos) 的世界發現”) 提到安德拉德 (Fernão Peres de Andrade) 率領的艦隊前往馬六甲和中國的航程 (1517)、首個歐洲國家駐中國的正式外交使節皮雷斯 (1517-1521) (Tomé Pires) 的旅程以及被稱為登上中國大陸南海岸的第一人 (1516、1517), 葡萄牙探險家佩雷斯特羅 (Rafael Perestrelo) 的活動: “他抵達了中國: 沒有大使信函他無法登陸, 有個叫佩雷斯 (Thomas Perez) 的人接到他, 他去了廣州, 見了安高 (Anker), 他們從陸路旅行了四百里格來到了北京 (……)。” (卷10: 35-36頁) ⁽⁶⁵⁾

珀切斯還發表了一個信件集, 這些信是法國耶穌會士金尼閣 (Nicholas Trigault) 所寫 (杜埃: 1577年-杭州, 1629)。⁽⁶⁶⁾ 信中記述了這個耶穌會士從里斯本到印度和中國的航海歷程 (1618) 以及中國和日本的基督教情況。還有一封考克斯寫給夏瑞思的信 (平戶, 12月31日), 信中提到澳門附近麒麟號的殘骸。(卷10: 頁74-83)

英國旅行家費齊 (Ralph Fitch) 在信件中記述了在澳門和日本之間進行的貿易、貨物情況及對澳門經濟的重要性, 也記述了葡萄牙人在廣州市場的商業活動以及城市的局限性、中國文化的一些側面, 如書法和納妾制度。哈克路特也曾發表過他的信件。“葡萄牙人從中國澳門去往日本時帶着白絲綢、黃金、麝香和陶瓷, 而從日本帶回的祇有銀子。他們有大船, 每年都要去, 所以每年都帶回六十多萬枚有十字架花樣的銀幣, 這些都是日本的銀幣, 他們每年還從印度帶回二十多萬枚銀幣。他們在中國佔了很多便宜: 從中國運出黃金、麝香、絲綢、銅、瓷器和其它昂貴和鍍金的東西。”

葡萄牙人來到廣州時要逗留一些時日, 入城時必須要簽名, 晚上出去要銷名。他們可以不整

夜待在城裡, 但如果沒有進城就要在船上過夜。如果過了准許居住的日期仍然沒走, 就會被捕。一個男人祇能有一個妻子, 但祇要他願意, 可以有很多妾。中國人、日本人和交趾支那人都用一支精緻的筆縱向書寫, 筆是用狗或貓的毛製成的。(卷10: 頁198)

林斯柯頓《航程》(通向果阿的航程, 對東印度群島的觀察)的縮略版被菲利普 (William Philip) 譯成了英文, 由哈克路特1598年出版發表。這個版本談到葡萄牙在果阿的貿易中幾次提及中國 (卷10: 頁225、249), 尤其是備受讚譽的“葡萄牙葡萄酒”的貿易 (卷10: 頁302)。“布朗日記簡要, 他的印度之行, 五年間的萬丹、帕塔尼亞、日本、馬尼拉、澳門、中國沿岸和其它印度港口之旅 (1619)” 講述了他自1617年起從英國 (Tilbury) 到遠東的歷程。

1621和1622年, 英國人尋覓併攻擊中國船隻, “公牛號” (Bull) ⁽⁶⁷⁾ 的船員闖入了葡萄牙的艦隊, 殺死了一些水手, 用俘虜交換了一些在澳門葡萄牙人手中的英國人 (卷10: 頁503-505)。英國人還將葡萄牙的戰艦趕回澳門, 在此之前, 他們剛剛目睹了在西班牙和荷蘭休戰十二年以後荷蘭人進攻澳門的最後一次敗績 (1622年6月24日): “一名神父和其他人一起手持白旗登船給自己人治病。12日, 十一艘荷蘭船進攻澳門, 不理睬我們, 祇是直接儘量靠近城鎮, 並派出了小船測探, 14日派遣一千人登陸對抗澳門人, 在激烈交火後被擊退, (我聽說)損失了六個船長和兩百多人, 還有許多人受傷, 聽他們自己講, 如果不是逃回船上, 都會被殺死。17日, 經同意, 我們開拔, 整夜都在拉德隆斯島下面拋錨。”

這次事件後, 如英國人和荷蘭人所說, 澳門不像看上去那麼易受攻擊, 在中國軍事援助下⁽⁶⁸⁾, 葡萄牙人抵擋住了一個由雷傑茲 (Cornelis Reijersz) 率領的十四雙戰船八百多人組成的荷蘭艦隊。兩艘來自英-荷防衛艦隊⁽⁶⁹⁾ 的英國船“王權伯爵號” (Palsgrave) 和 公牛號⁽⁷⁰⁾ 也加入進來, 但這兩隻船沒有參戰。考克斯也描述了這次襲擊, 這

次襲擊後，荷蘭人偽裝成英國人矇騙中國當局：“這一年，荷蘭人又派出一支由大大小小十四、五條船組成的新艦隊攻佔澳門，但是被擊退，有人說損失了三百人，有人說損失了500人，四艘船被焚，中國皇帝允許葡萄牙人駐守澳門，命令廣州官員支援澳門十萬人(……)。”⁽⁷¹⁾

歐洲“敵人”經常騷擾澳門⁽⁷²⁾，在平托商站的考克蘭姆(Joseph Cockram)也描述了荷蘭的進攻並告知巴達維亞(Batavia)，由於荷蘭人的威脅，葡萄牙船隻無法離開澳門。⁽⁷³⁾傳教士馬利克(Sebastião Manrique)撰寫的《東印度行程的使命(1649)》告訴我們，荷蘭的這次入侵，使中國當局允許葡萄牙人在澳門修築工事，作為防禦戰略，⁽⁷⁴⁾並提到了英國參與了這次襲擊。⁽⁷⁵⁾這次失敗後，荷蘭人放棄了中國沿岸，到澎湖列島和臺灣去碰運氣。

第十一卷記述了自中世紀至葡萄牙人來到中國這一期間幾個歐洲人對中國之行的描述：如哈克路特已經發表的弗蘭德方濟各會修士羅布羅齊斯(William de Rubruquis)的中國之旅，還有溫德沃(Roger of Wendover)、馬可波羅、亞美尼亞人安東尼(Anthonie the Armenian)、曼德維爾(John Mandeville)、阿爾哈森(Alhacen Ibn al-Haytham)、克魯茲(Gaspar da Cruz)、佩雷拉(Galeote Pereira)、曾到訪過威尼斯，其報告曾被拉姆索(Ramusio)和哈克路特發表過的波斯旅行隊的商人莫美特(Chaggi Memet (Hajji Mahommed)、威尼斯商人康迪(1444)(Niccolo di Conti)等人前往中國的旅行描述。其中康迪的文章曾在1500年左右應葡萄牙國王曼努埃爾一世(Manuel I)的要求被翻譯成葡萄牙語(卷11: 頁394頁)。這些信息源還涉及到威洛比爵士(Sir Hugh Willoughby)、錢塞勒(Richard Chancellor)和簡金森(Anthonie Jenkinson)的英國人北部之行。與哈克路特相同，珀切斯也發表了一些中國條約翻譯的縮略本，如克魯茲的文獻〈中國和毗鄰地區的論述，多米尼加修士克魯茲，獻給葡萄牙國王塞巴斯蒂安〉(“A treatise of China and

the adjoining Regions, written by Gaspar Da Cruz a Dominican Friar, and dedicated to Sebastian King of Portugall)”(卷11: 頁474)、佩雷拉的著述〈一個具有良好信譽的紳士但被囚禁在中國的佩雷拉的故事〉“The relation of Galeotto Perera, a Gentleman of good credit, that lay Prisoner in China”)，威爾斯(Richard Willes)將其從意大利語翻譯過來並首次發表。在旁註的描述中，珀切斯通過馬可波羅、平托(卷11: 頁478、493-494、502)等人著作的相互佐證告訴讀者哪些東西被省略、經過篩選，當地人的生活如何，同時還講解了那些如果不加以解釋英國人很難理解的歷史和文化(卷11: 頁482-483、486、493-498、507、513、536、538、566-594)。在518頁的頁邊上，珀切斯告訴讀者：“我有很多中國女人的照片，她們或者裹着腳、或者腳很小，她們的眼睛和鼻子都很小，這些從圖中都可以看出。”(卷11: 頁518)根據華世伯恩(W. E. Washburn)所述，珀切斯在用指代非歐洲人的詞語中，常用“少數民族”或者“自然人”(naturals)這些字眼，很少用“土著人”這個詞，而中國人從馬可波羅和其他早期到訪中國的旅行者的描述中，一直都有優越於歐洲人的神秘感。⁽⁷⁶⁾編者發表在第十二卷470-473頁上的地圖，是從中國得到天朝地圖，第一次在歐洲出版，⁽⁷⁷⁾該圖包括了東印度公司夏瑞思船長1613年在印度尼西亞的班坦得到的地圖版本的摘錄，夏瑞思的地圖是他在航行日本期間一個中國人頂債還給他的。卡克魯伊特從夏瑞思船長手中得來，珀切斯又從他的文獻中繼承⁽⁷⁸⁾，但苦於找不到人能把中國字翻譯過來，他祇能把它描述為大約四、五英尺，圖本身有一平方碼，文獻的其它地方有寫滿了關於中國的行政、河流、語言、政治權利和人口的評論(《中國論述》)：“這是對中國的真實描述，中國人自己扮演了嚮導，耶穌會士充當了校對和翻譯”(卷11: 頁471)。這張地圖的定向方式是，在該頁的右側為北，把朝鮮作為一個延長的半島包括進來。編輯者還繪有插圖，包含第一個在中國建立天主教的耶穌會士利

瑪寶、身着盛裝的兩個中國人，一男一女。據什切尼亞克⁽⁷⁹⁾ (Boleslaw Szcześniak) 所說，如果不算耶穌會士，珀切斯是第一個發現比奧特留斯 (Abraham Ortelius)、墨卡托 (Gerardus Mercator) 或者洪迪斯 (Jodocus Hondius) 的地圖優越的中國地圖的作者。珀切斯毫不掩飾他反耶穌會的偏見，⁽⁸⁰⁾ 但是他欣賞利瑪竇的作品並從中收集了許多有關該國的信息。然而，像其他清教徒作家一樣，他對耶穌會在中國的宗教活動持批評態度。

這本文集中有關中國的插圖補充了葡萄牙作者的記述，使文章更具可信性。在克魯茲有關中國論述的文章發表後，珀切斯告訴讀者，自己作為編輯在讀到佩雷拉的文章的基礎上，考慮到讀者的“期待值”所作出的選擇：“我覺得還是要在這裡加上佩雷拉的故事 (……)，從這位親眼所見的修道士中節略一些你們想第一手獲得的東西，但也要避免冗贅。” (卷11: 頁565)

第十二卷出現了一些平托〈朝聖〉一文和其它歐洲關於中國信息源中涉及澳門的節選。在平托文章之前，珀切斯使用了很長篇幅為讀者撰寫了“平托介紹 (Introduction to Mendez Pinto)”：“在向你們介紹這位作者時我遇到很多麻煩，包括他的語言、他的葡萄牙背景(我極盡所能來理解所有這些以及這篇文章的其它方面的藝術和技巧)，以及他記述的稀缺，在很多方面都不能從其他作者那裡找到佐證或反證。他在其著作出版之前就去世了，耶穌會士利瑪竇也是如此。因此這就不僅需要人格的保障還需要誠信，誰還會對一個死人奉承或撒謊呢？” (卷12: 頁54-55)

該編輯祇截取了有關對中國和塔塔人 (Tartaria) 的描述，他還為平托的錯誤和矛盾做辯護，提到自己作為編輯和作者所犯的錯誤，告誡讀者，這些“喜劇和悲劇的事件”或許是這位葡萄牙作者的幻想 (卷12: 頁12、58)，還提到一句已經逐漸消失的老諺語，從這句老諺語中引出了一句押韻的俏皮話“費爾南，你在說謊吧？我就是說謊！”。⁽⁸¹⁾ 珀切斯總結了平托抵達中國以前的活動，省略了他漫遊的幾個部分 (卷12: 頁

60-61)，如他處理克魯茲和佩雷拉的文章一樣，他使用了頁邊註腳，使讀者對文中提到的異國實際情況及為豐富閱讀增加的原文有所瞭解，並對編纂者的特點和方法加以瞭解。珀切斯還引用了耶穌會士們的文章來改正“朝聖”一文 (卷12: 頁94) 中的錯誤，通過將文章和聖經進行對比找出雙方的相關之處 (卷12: 頁119)。

1953年，伯克瑟 (Charles Boxer) 在發表早期歐洲人對中國的記述中，引用了珀切斯關於修道士加斯帕爾的版本，提到了他的編輯方法，對他的用詞進行了闡述：“仔細評估珀切斯1569年從葡萄牙語翻譯過來的譯文後可以看出，文中沒有人們常常提到的“他所發表的與原材料的比較顯示，他不是一個誠信和明智的編輯和彙編者”這種說法。至少從這個實例中可以看出，這種說法是過於嚴酷的。珀切斯省略的大部分可以用事實得到說明，這個事實是他省略或刪減的材料來自佩雷拉的著作，而佩雷拉的記述在《遠遊者》的同一卷中重新翻印了。”⁽⁸²⁾

在與日本相關的同一個主題中，馬夏瑞拉 (Derek Massarella) 提到，在來自日本的日記、信件和其它文獻中，祇有很少一部分出版，也祇有在珀切斯的《遠遊者》中。他斷言，珀切斯發表的關於日本的材料“依然是後來作者撰寫這個國家的時候所能依靠的主要來源，尤其是那些編撰大部頭有關這些遙遠國度、用來滿足讀者需要的文集的17世紀的遊記作家”。⁽⁸³⁾

摘自阿沁索拉 (Bartolomeu Leonardo de Argensola) 條約〈征服馬六甲群島 (Conquista de Islas Malucas)〉一文 (馬德里，1609年，頁336-337)，寫於1601年的兩封信提到了本傑明·伍茲 (Benjamin Woods) 1596前往中國的遠征，但是他沒有到達目的地。⁽⁸⁴⁾ 第一封信是九龍江的到訪者寫給菲律賓總督阿庫尼亞 (Pedro Bravo de Acuña, 1602-1606) 的。這封信證實，英國人抵達時伊比利亞人的恐懼，因為他們不知道他們是不是來搶劫的 (卷12: 頁219)。在第二封信中，阿庫尼亞回信說：“他們決定不接待抵達中國海岸的英國



船，雖然他們不是西班牙人，他們也還是把他們當做敵人和海盜。因此如果他們去馬尼拉，就會受到懲罰（……）。我們不接受任何來自敵人的恐嚇和威脅。”（卷12：頁221-222）

珀切斯還使用了利瑪竇對葡萄牙耶穌會士鄂本篤中國之旅的文獻（《基督教遠征中國史》，1615年（*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 apud Sinas*, 1615）修改版，該版是1616年被翻譯成法語的。“鄂本篤是第一個在中亞地區通過陸路從印度前往中國的人（1602-1605）。”⁽⁸⁵⁾利瑪竇在文章中簡述了葡萄牙人在澳門的生活：“葡萄牙人佔據了阿媽港（Amacao），他們有的住在廣東省，在那裡定居，娶妻生子，把自己當成了當地人（……）。這些葡萄牙人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卷12：頁234，另見頁238）

第五章收集了耶穌會士在中國和日本佈道的歷史文獻（“遠東的耶穌會士”），包括沙勿略、澳門第一位主教努涅斯（Melchior Nunes）[原文如此，賈耐勞主教（Belchior Carneiro Leitão）]和到訪者范禮安等人在澳門的傳教活動。⁽⁸⁶⁾當談到沙勿略經歷暴風雨抵達中國時，該編纂者告訴讀者，葡萄牙人在上川（Sancian（Shangchuan））與中國人做生意，因為當時阿媽港還沒有建成。在1511年佔據馬六甲後，葡萄牙人試圖在中國沿海的幾個地方建立自己的據點：1513年在屯門島（Tunmen）（現在香港的大嶼山）立足，1515-1539年間在廣東地界立足，1540和1548年佔據了浙江的寧波。1549年他們被驅逐出九龍江（福建省），1550-1553年間，他們在上川島做生意（廣東省），後又在浪白溜（Lampacau）做生意，直到1560年。1553年以後，他們到了澳門，中國當局允許他們在這個飛地長期落腳。⁽⁸⁷⁾根據珀切斯發表的資料，那時葡萄牙人急於與中國人做生意，而中國人鑒於外國人的所作所為，對他們心存疑慮：“根據在廣東的摩爾人對這些佛朗機人（Franks）的描述（又被稱為歐洲人），他們好戰，又能取勝，就像他們在馬六甲和印度一樣，表面上是商人，聽從葡萄牙人的指揮。廣東的中國人稱他們為佛朗機人

（Falanks）：因為他們沒有R的發音，不習慣兩個輔音中間沒有原音的發音方式。他們將葡萄牙大炮也這樣稱呼。在利潤的誘惑下，他們來這裡做生意，市場關閉時，他們就離開，帶着貨物前往印度。這個過程持續了經年，直到中國人的恐懼感減少，允許他們在半島的大一些的島嶼上居住。此地有一受崇拜的神，現在依然存在，被稱為阿媽（媽祖Ama），因此這個半島被稱為阿媽港，這就是阿媽灣。⁽⁸⁸⁾這個地方與其被稱為半島，不如說它是塊大巖石，自此，不僅葡萄牙人開始在這裡定居，還有那些毗鄰國度的人們也開始聚集在這裡，由葡萄牙商船運來的歐洲、印度和馬六甲的商品、特別是銀幣也吸引了中國人來此居住。隨着時間的推移，城市初具規模，葡萄牙人不但與中國人做生意，也與他們通婚，半島上建起了私人住房，這個荒涼的巖石上矗立起一個宏大的市場。如利潤把商人引來一樣，對靈魂的關注把神父和宗教人士也吸引來了。葡萄牙國王給了這個地方一個特權，派了一名主教進駐。耶穌會士在此蓋起了住宅，修建了第一個教堂，後來又建起其它教堂。中國大陸位於此地的北部、摩鹿加群島位於南部、日本和菲律賓位於東部，位於西部的有交趾支那、柬埔寨、暹羅和其它國家，這使葡萄牙人的設計規劃很方便。自此以後，許多試圖到中國探險的人都無果而終，那些土地不適合耕種。努涅斯（伊斯蘭紀元1555年）從廣州記述了他在前往日本途中，在相關海域遇到強風暴，偶然登陸中國的經歷。”（卷12：頁246-247）

這些材料還提到了中國對在中國沿海被捕的葡萄牙水手執行死刑的事件，討論了作為羅明堅、利瑪竇等人在遠東傳教工作的中心的澳門學院的重要性（卷12：頁248-254）。被外國“鬼佬”（卷12：頁274）居住的澳門是被從中國和日本驅逐的傳教士的避難所，在那裡，他們可以學習中文，瞭解當地的文化和風俗習慣。傳教士還利用澳門獲取他們的工作補給、給中國當局準備歐洲的禮品、教育培訓將來在中國擔任神父的人選（澳門學校，卷11：頁290）、治病療傷、為自己的貿易

做準備(卷12: 頁269-291、303、312-313)。龐迪我神父⁽⁸⁹⁾(Father Diego de Pantoja)從北京(1602年3月9日)寫給他的保護人托萊多(Toledo)耶穌協會會長古茲曼神父(Father Luis de Guzmán)的信中也提到了這個城市作為亞洲宗教活動中心平臺的作用, 信中這位西班牙耶穌會士講述了進入中國的困難和以上帝的名義建立耶穌會士學院的重要性: “來到了這個與中國大陸連接的、由葡萄牙人佔據的城市澳門, 這裡有一座我們修會的學院, 在日本的迫害、騷亂和戰爭以後我就在此逗留, 我們十到十二名神父獲准在此地經過, 等待合適的時機: 我們已經做好準備, 在幾個月之內, 上帝會改變我的命運, 把我送到中國[1599]。” (卷12: 頁332)

在研究了龐迪我關於16世紀中國形象的描述以後, 蒙克(Beatriz Moncó)說, 他與利瑪竇和其他耶穌會士一起的旅行使他能夠從更深度的哲學方面去分析儒家學說, 連接中西文化⁽⁹⁰⁾, 這些從他在巴利亞多利德(Valladolid, 1604)、塞維利亞(Seville, 1605)和帕倫西亞(Palencia, 1606)發表的信件可以看出端倪, 這些信件也被編輯到了《進入中國的部分耶穌會神父名單(Relación de la entrada de algunos Padres de la Cópia de Jesus en la China)》(塞維利亞 Seville, 1605)一書。

第十二卷(對中華王朝的論述, 摘自利瑪竇和金尼閣包括國家、人民、政府、宗教、禮儀、教派、特徵、學習、藝術、行為的論述, 另見一張中國地圖、便於理解的相關註釋)第七章的第六節(關於在中國的陌生人和外國宗教)顯示, 中國明朝人對陌生人有敵意, 該節還講述了被北京朝廷稱為澳門耶穌會士同胞的那些教士們在中國的活動: “中國人把澳門交給了葡萄牙人, 這些耶穌會士藉此可以走私貨品。他們通常每年兩次來到廣東的主要城市, 不是省會廣州(Quantum), 而是泉州(Quam ceu)。白天他們可以携貨物自由出入, 但到晚上必須到船上睡覺。在河中心有個小島, 小島上有座廟, 這些教士獲准在廟裡從事天主教活動。他們乘船進出中國。據觀察, 那些從陸路進入中國的馬胡摩坦(Mahumetan)人, 如果住

够九年就不再回國。現在有上千家庭分散在中國廣東省的主要城市。” (卷12: 頁464-465)

亨利·費聶(Henri de Feynes)(又被稱為蒙法特‘Monfart’伯爵, 1573-1647)是一位通過陸路在1608⁽⁹¹⁾進入廣州的法國人。他的文章被不知名的作者翻譯成英語, 於1615年在倫敦發表(比用法語發表早了五年), 題目是“對整個東印度群島, 還有對中國重要城市廣州的準確、奇妙的調查: 由蒙法特先生進行的、迄今為止通過陸路所作的調查業已結束”。⁽⁹²⁾

珀切斯在本節出版的蒙法特先生遊記的摘錄用於描述耶穌會士在中國的存在, 反映了澳門對傳教工作的重要性, 記述了荷蘭人截獲瑙道(nau do trato)號、離開澳門時的惡劣條件, 這次襲擊是針對耶穌會士投資(卷12: 頁482-483)所採取的行動, 很多作者一直對此次襲擊採取懷疑態度, 認為它是杜撰出來的。⁽⁹³⁾同一個資料來源提到荷蘭人如何試圖從福建省進入中國, 但沒有成功, 在阿媽港的葡萄牙人又如何因為害怕而建塔加強防範(卷12: 頁483)。資料提到, 兩個神父之間的爭吵引起澳門的騷亂, 中國居民逃往大陸, 告訴他們的同胞, 外國人企圖入侵天朝, 這導致了廣州和澳門之間所有通信和貿易的中斷。⁽⁹⁴⁾他這樣描述道: “在高山下、海岸邊坐落着一座城市, 過去葡萄牙人建有一座大城堡, 直到現在, 還有很多葡萄牙人住在那裡, 這是進入中國的入口處, 但並不太重要, 他們是異教徒, 當地居民開始看他們的臉色行事。” (卷12: 頁494)

他提到的這個片段很可能涉及到意大利耶穌會士郭居靜(Lazzaro Cattaneo, 1560-1640)⁽⁹⁵⁾, 他在1604和1606之間對澳門影響很大。郭居靜1593年旅行到了澳門, 學習中文, 與利瑪竇和龐迪我一起在中國工作。1604年, 他回到澳門, 去了一趟馬六甲, 回來後發現, 1606年他捲入了一場葡萄牙人和中國人之間的政治危機。荷蘭人已經開始在澳門攻擊葡萄牙人的利益, 葡萄牙人開始加固城市的防禦, 這引起了中國人的擔心, 認為葡萄牙人要進攻中國, 擁戴郭居靜做皇帝。在由已

經變為奧古斯丁教士的前耶穌會士的領導下——蒙法特提到過的另一個神父——有些不滿的反對派散佈謠言，引發葡萄牙教堂被劫掠和焚燒，澳門的部分人口逃離，廣州城開始備戰，澳門這個飛地面臨戰爭和饑餓的威脅。直到一個從廣州派來的官員發現澳門並沒有危險、郭居靜是一位和平人士，這場危機才結束，1606年，郭居靜獲准返回中國大陸。⁽⁹⁶⁾後來有篇文章解釋了中國官員所控訴的耶穌會士犯下的罪行。⁽⁹⁷⁾

《遠遊者》第十三卷描述了英國人在北部海域的發現及發現東北和西北通路的航程，第十四卷包括“英國人向北的航海和發現，格陵蘭(Groenland)西北通道和其它北極地區的記述以及後來在俄國發生的事件，同時還有安東尼奧·赫雷拉(Antonio de Herrera)對西印度群島的描述(包括巴西)”。最後一篇文章“安東尼奧·赫雷拉陛下在印度群島的主要編年史作者和城堡編年史作者對印度群島的描述(1601年)”對澳門做了如下描寫：“葡萄牙人有個城鎮，中國人瞭解葡萄牙人的勇猛，知道他們強於菲律賓的卡斯提爾人(Castillians)，忍受着他們的邪惡統治，而葡萄牙人為了自己在中國有利可圖的商貿千方百計保存自己。葡萄牙人有時也插手廣州，三康(Sancon)(原文如此)是來自廣州的第三十個社團。”(卷11: 頁558-559)

第十五卷主要講述了有關西印度群島的情況，特別是墨西哥。第一個文獻“收集了一個名叫約瑟夫·阿科斯塔(Josephus Acosta)的博學的耶穌會教師所著的第一、第二、第三和第四卷的內容，涉及西印度群島的天空、空氣、水、土地等自然現象的情況，也提到了野獸、魚類、家禽、植物和大自然其它珍品”。該文獻讚揚葡萄牙人“作為一個民族，在航海技術方面優於其他民族”(卷15: 頁2)，認為澳門位於“廣東的一個小島上”，“離菲律賓還有一天的航程”。(卷15: 頁60)

第十六卷描述了通往美洲大陸的航行(包括巴西)以及在海陸遇到的衝突，即幾次對船隻的襲擊。

給坎特伯雷大主教的書信描述《遠遊者》不是一本“世界航海和旅行的書，而是載入世界航海旅行歷史的世界”，讚美了英國的名望和光榮(卷16: 頁2)。第一個文獻簡要記述了坎伯蘭郡(Cumberland)伯爵喬治(George)的多次航海，包括日記和記敘文，描寫了截獲幾隻葡萄牙船的歷程，有“五傷號”(Five Wounds)和“聖母號”(Mãe de Deus 或被稱為 Madre de Dios)(1592)。這些文獻哈克路特也有出版。約翰·伯勒爵士(Sir John Burrough)1592年在亞速爾群島(Azores)截獲了馬德雷德·迪奧斯號，將船上的貨物運回英國(卷16: 頁16-25)，這使倫敦的商人認為如果他們打破葡萄牙人在貿易上的壟斷，他們也可以坐享富貴。⁽⁹⁸⁾

如前一卷一樣，第十七卷記述的也是前往美洲大陸的航海，也就是去往葡萄牙的殖民地巴西和馬德拉群島(Madeira)及亞速爾群島的航程。下一卷繼續描述在大西洋的航行，如前往亞速爾群島、弗羅里達、弗吉尼亞和北美其它地方。而倒數第二卷的記述包括了前往弗吉尼亞、新英格蘭的夏島(Summer Islands)、紐芬蘭(Newfoundland)、新蘇格蘭(New Scotland)等地的航程，還包括了針對西班牙的伊麗莎白海戰。最後一卷包括了關於英國人前往卡迪茲(Cadiz)航程的簡要報告(1596)和艾塞克斯伯爵(Earl of Essex Robert)前往亞速爾群島(Azores)的報告(1597)。“本書結束語”(卷20: 頁130-135)告訴讀者：“在如此多有自己獨特的運行軌道的行星中我們找到了這個世界(……)。就像在幾何羅盤中，一個針固定在中央，另一個做圓周運動，珀切斯和《遠遊者》也是如此：他們有自己的運動，但是在這個圓周中受作者的指揮，他待在中心的家中，而絕不會是從他的出生地艾塞克斯(Essex)的薩克斯特德(Thaxted)(……)走出200多英里(……)。所有國家都在這個圓中起舞，為英國人服務，英國旅行家享受在其中，其他人用他們的旅行使英國人更加完美，至少是使英國人掌握了更多的世界知識。”(卷20: 頁130)



TO THE MOST
HIGH AND EX-
CELLENT
PRINCE,
CHARLES,
PRINCE OF
WALES.

Most Excellent Prince,



*As a poore Pilgrime salute Your High-
nesse in the words of a better SAMUEL ^{1.Sam.9.20.}
and SEER, On whom is the desire of
all Israel? is it not on Thee and all thy
Fathers House? In this House we ad-
mire the innumerable Royall Ancestrie,
wee triumph in His Maiesties present
light, wee praise God and pray for the two hopefull Columnes,
that they may be Pillars of Stabilitie and Strength in the ^{1.Kin.7.21.}
Lords House, firmer then SALOMONS IACHIN and ^{Apoc.3.12.}
BOAZ.*

*SIR, hauing out of a Chaos of confused intelligences fra-
med this Historicall World, by a New way of Eye-evidence;
Your Princely pietie, innate clemency, and the Time it selfe
(festiuall both in the ordinarie season and extraordinarie pre-
paration) emboldned my obtrusion on Your Highnesse. The
Magnificence of Your Princely Court hath entertayned Men of*

編者就這樣幽默地結束了該文集。雖然他記述了許多航海，和讀者一起周遊世界，但是他從來沒有到過離家鄉200多英里遠的地方，而其他英國人出去航行，給自己國家爭得榮譽，使每個人打開了眼界。就像阿姆斯特朗(T. E. Armstrong)所說，雖然指出一位編者的錯誤比歷數他的成功要容易得多，但珀切斯確實有很多方面的成功，所以他一些對細節的忽略可以被忘記。⁽⁹⁹⁾

現在一些學者依然在從政治科學到歷史、從宗教到社會學、人類學、旅遊文學和地理學等很多領域廣泛使用編者的著作，這證明了他著作的持續價值。我們可以用瑪格麗特·宏根(Margaret T. Hodgen)的話來描述珀切斯的著作，尤其是她做出的結論指出，16和17世紀的文學在文化和社會研究方面的科學方法，為現代人類學和其它很多科學都打下了基礎：

“第一，從娛樂目的向有序詢問動機的確切轉換中；第二，在對問題或重要情況敘述的或多或少清晰程度上；第三，在應用論述有關人類起源、文化多樣性、相似性的重要意義、高度文明的續發事件、文化變遷過程等問題的題材的選擇上。”⁽¹⁰⁰⁾

像哈克路特文集和其它後來許多著作一樣，《遠遊者》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被富賈森(Niall Ferguson)稱之為“英國化”的經濟現象，並為此做出了貢獻，“英國化”也就是被英國及其殖民地促進的全球化的歷史。⁽¹⁰¹⁾

在哈克路特《航海》的發表和珀切斯《遠遊者》的寫作之間，英國和荷蘭的東印度公司進行了多次航海，鑒於此，後者的著作比前者的著作中關於東南亞⁽¹⁰²⁾的信息含量更高，澳門和日本見證了葡萄牙人帶回歐洲的財富。《遠遊者》的發表使英國公眾整體上進一步瞭解了澳門、日本和中國，信息來源多來自英國人和葡萄牙人；澳門與遠東的傳教活動密切相連，事實上那裡已經成為世界這端宗教和教育的中心。珀切斯發表的信息資料的時間是從東印度公司和荷蘭東印度公司意識到印度狀況是多麼脆弱，而葡萄牙人在

東方的貿易是多麼有利可圖開始。意識到這一點使得英國和荷蘭採取了“肆意掠奪敵人的政策”⁽¹⁰³⁾，我所分析過的文獻就記述了荷蘭人除了對城市本身進行攻擊外，還襲擊了城市的船隻、貨物和其它利益，也講了葡、西兩國在東南亞的競爭。荷蘭人在馬六甲海峽的掠奪迫使在澳門的葡萄牙商人轉向日本經商，一直到1639年⁽¹⁰⁴⁾，他們也受到清教徒競爭對手的“襲擊”。關於澳門的信息資料揭示，英國商站在平戶的建立有利於17世紀英國人對澳門和日本的瞭解，葡萄牙先驅者的官方材料對英國人來說仍然是信息源頭，他們還顯示英國和葡萄牙雖然在歐洲是老盟國，但是在遠東是競爭對手。珀切斯發表的文獻反映了葡萄牙人、英國人和荷蘭人在亞洲的競爭。

在澳門問題上，在很大程度上，由於葡萄牙人在澳門的立足並長期佔領，編者從這三個為自身利益及在為爭奪與中國直接貿易權而戰的敵對方獲取了資料，並將其發表。

【註】

- (1) 關於珀切斯的神學著作，見潘寧頓(L. E. Pennington)編輯的《珀切斯手冊：對塞繆爾·珀切斯生活和著作的研究1577-1626》(*The Purchas Handbook: Studies of 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Samuel Purchas 1577-1626*)一書中波特(H. C. Porter)所著的〈作為神學地理學家的珀切斯〉(*Purchas as Theological Geographer*)，卷一，頁181-189。
- (2) 伊斯特伍德是一個船舶停靠的地點，距離泰晤士河上的利(Leigh)有兩英里，編者從那裡可以收集到還家的遊人的文獻和證據。例如，他就從一個來自利、名叫安德魯·巴特爾(Andrew Battell)的人那裡得到了信息，巴特爾是被葡萄牙人作為囚犯帶往了安哥拉。(見《出版者的話》，塞繆爾·珀切斯編著，“哈克路特或珀切斯的‘遠遊者’都包含了英國和其他旅行家環遊世界的海陸旅行史”(Hakluytus Posthumus or Purchas His Pilgrimes Contayning 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Sea Voyages and Land Travells by Englishmen and Others)卷一，頁22)。援引以後，“遠遊者”的卷數和頁數將放在圓括號中。
- (3) 見斯蒂爾(Colin Steele)所著《從珀切斯到史蒂文斯(Stevens)對伊比利亞人新世界的英文翻譯(1603-1726年)》(*English Interpreters of the Iberian New World from Purchas to Stevens (1603-1726)*)：著書目錄研究

- (A Bibliographical Study), 頁15-51”。關於1603前的英語翻譯, 見頁9-14。
- (4) 同上。奎恩 (D. B. Quinn) 編著的《從哈克路特到珀切斯》(From Hakluyt to Purchas), “哈克路特手冊”(The Hakluyt Handbook) 卷1, 頁74-96, 從“遠遊者”一書中找出了121個哈克路特收集的名目。另見厄尼斯 (Carol Urness) 所著“作為編輯的珀切斯”(Purchas as Editor), 收入潘寧頓編著的上述著作, 卷1, 頁142; 里奧·米格·普伽引自《哈克路特文集》〈“航海”中葡萄牙人在澳門和日本的出現〉(The Presence of the ‘Portugals’ in Macao and Japan in Richard Hakluyt’s Navigations) 一文, 葡萄牙人/日本人研究快報 (Bulletin of Portuguese/Japanese Studies), 卷5, 頁81-116; 同上, 〈在哈克路特的“主要航程”一文中葡萄牙人的發現〉(Os Descobrimentos Portugueses em The Principal Navigations de Richard Hakluyt), 《海外歷史編年史》(Anais de História de Além-Mar)。卷4, 頁63-131。
- (5) 見科林·斯蒂爾所著的上述著作 1-15頁。論珀切斯著作對17世紀到20世紀的影響和重要性, 見潘寧頓編著的《塞繆爾·珀切斯, 其聲譽與著作的應用》(Samuel Purchas, His Reputation and the Uses of his Work); 帕梅拉·內維爾·星盾 (Pamela Neville-Sington) 著《珀切斯主要文獻》(The Primary Purchas Bibliography); L. E. 和 G. Z. 潘寧頓 編輯的《珀切斯次要文獻》(A Secondary Purchas Bibliography), 另分別參見L. E. 潘寧頓(編輯)的上述著作, 頁3-118、頁465-573和頁574-743 (卷2)。
- (6) 根據收入潘寧頓編輯的上述著作中奎恩的文章〈周遊世界〉(The Circumnavigations) (卷1, 頁190), 珀切斯使用的信息源來自哈克路特1589和1600出版、德雷克和卡文迪什敘述的英國人周遊世界的歷程, 關於莫格蘭 (Magellan) 的首次航海, 他依靠的是皮加費塔 (Pigafetta) 的敘述, 該敘述早就出現在理查德·艾登 (Richard Eden) 的英語簡版中 (1555), 但是他的評論使這個敘述更完善。珀切斯所有信息來源表見約翰·帕克 (John Parker) 的〈珀切斯的“遠遊者”的內容和資料來源〉(Contents and Sources of Purchas his Pilgrimes), 該文收錄在潘寧頓編輯的上述著作中, 卷2: 頁383-464。在383頁, 帕克這樣描述這位編者的著作: “珀切斯不僅是文章的編輯, 也是一位能够從資料中提取編年史的人, 同時他的博學可以支持一個觀點或一種偏見。”
- (7) 關於珀切斯對葡萄牙語資料的翻譯見托馬斯 (H. Thomas) 所著的〈1640年前出版的葡萄牙人航海和發現記述的英文翻譯〉(Portuguese Accounts of Voyages and Discoveries in English Translations Published before 1640), 收在 AA. VV 中, 《葡萄牙世界大會》(Congresso do Mundo Português), 卷4, 第二冊, 頁189-195。
- (8) 在威爾斯出版加里奧特·佩雷拉 (Galeote Pereira) 的《中國論述》(Treaty on China) 的文集中, 首次出現了對日本的英語描述, 由葡萄牙耶穌會士路易斯·弗洛伊斯 (Luís Fróis, 1532-1597) 的著作中翻譯過來。見帕斯克·史密斯 (M. Paske-Smith) 編著的《英國和日本: 第一個已知事宜英語的記述, 摘自“遊歷史”》1577年 (England and Japan: The First Known Account of Japan in English extracted from “History of Travayle” 1577)。
- (9) 見金國平 (Jin Guo Ping) 和吳志良 (Wu Zhiliang) 編輯的《重溫澳門的起源: 新的歷史觀》(Revisitar os Primórdios de Macau: Para uma Nova Abordagem da História), 頁11-42。
- (10) 英國在日本的商站是1623年關閉的。但是根據珀切斯在“致讀者”(To the Reader) 一節中的描述, 4000頁的《遠遊者》的出版始於1621年8月, 所以當這些信息收集整理時, 英日貿易仍然很活躍。
- (11) 見收集在潘寧頓編輯的上述著作中埃德溫·凡·克雷 (Edwin J. van Kley) 和福斯 (T. N. Foss) 所著的〈遠東地區〉(The Far East) 卷1: 頁276-277。
- (12) 見唐納德·拉克 (Donald F. Lach) 所著“歐洲形成中亞洲的作用”(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卷1, 第一冊, 頁18-19。
- (13) 同上, 卷1, 第一冊, 頁150。
- (14) 見范·克雷 (E. J. van Kley) 和福斯 (T. N. Foss) 的上述著作, 頁275。本段珀切斯著作中關於中國的描述, 我使用了克雷和福斯的文章, 特別是頁274-275。
- (15) 見《文化雜誌》系列2, 21期, 1994年10月/12月, 另見《文化雜誌》系列2, 30期, 1997年1月/3月, 還有利亞姆·布羅奇著 (Liam M. Brockey) 〈一個喉舌: 中國耶穌會士與澳門學院, 1579-1623年〉(A Garganta: The China Jesuits and the College of Macao, 1579-1623) 《文化雜誌》外文版, 第5期, 2003年1月, 頁45-55。
- (16) 見錢鍾書著《十七世紀英國文學中的中國》(China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Seventeenth-Century), 中國文獻學季刊 (Quarterly Bulletin of Chinese Bibliography), 新增序列, 卷1, 1940年出版, 頁353-366。
- (17) 參見阿拉薩拉特南 (S. Arasaratnam) 著〈東南亞〉(Southeast Asia) 編入潘寧頓編輯的上述著作, 卷1: 頁256-257頁, 頁261。
- (18) 關於英國文學中澳門的展現見普伽的〈英國文學中澳門的異邦風情〉(Macau enquanto cronótopo exótico na literatura inglesa) 收入《英-葡研究第一次代表大會紀要》(Actas do I Congresso de Estudos Anglo-Portugueses), 里斯本, 2001年5月6-8日, 頁705-723 (也用中文出版《行政, 澳門公共管理雜誌》(Administração: Revista de Administração Pública de Macau), 卷16, 第59期, 澳門出版, 2003年, 頁117-139), 同前, 〈英國詩歌中的澳門〉(Macau na poesia inglesa) 收入安娜·瑪麗亞·阿馬羅 (Ana Maria Amaro) 和朵拉·馬丁斯 (Dora Martins) 合編的《中

國研究VII》(*Estudos Sobre a China VII*)，卷2：頁847-882。同上，“英國文學中的澳門”(Macau na literatura inglesa)《文化雜誌》外文版，第24期，2007年10月，頁90-105。關於17和18世紀英國中的中國形象見阿道夫·雷德文(Adolf Reichwein)著的《中國和歐洲：18世紀知識與藝術的接觸》(*China and Europe: Intellectual and Artistic Contact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頁15-21托馬斯·李(Thomas H. Lee)編輯的《中國和歐洲：十六至十八世紀的形象和影響》(*China and Europe: Images and Influences in Sixteenth to Eighteenth Centuries*; Adrian Hsia (ed.), *The Vision of China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艾德里安·夏(Adrian Hsia)編輯的《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英國文學中的中國視野》(*The Vision of China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頁3-28和錢鍾書所著《十七世紀英國文學中的中國》(*China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范存忠所著的《中國文化在英國影響的開端》(*The Beginnings of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Culture in England*)，錢鍾書所著《十八世紀英國文學中的中國》，艾德里安·夏編著的《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英國文學中的中國視野》，頁29-68、頁69-86、頁117-215。另見威廉·沃森·阿普爾頓(William Worthen Appleton)所著《古中國的周期：中國時尚在十七和十八世紀英國的流行》(*A Cycle of Cathay: The Chinese Vogue in England during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喬納森·思彭斯(Jonathan D. Spence)所著《十六世紀末至今西方人對中國的認知》(*Western Perceptions of China from Late Six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保羅·拉普(Paul S. Ropp)編輯的《中國傳統：對中國文明的當代視角》(*Heritage of China: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on Chinese Civilization*)，頁1-14，同上，《中國的大陸：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國》(*The Chan's Great Continent: China in Western Minds*)，頁41-164。

(19) 見普伽著：《委婉語世界：澳門代表在奧斯汀科茨(Austin Coates)的工作》(*A World of Euphemism: Representação de Macau na obra de Austin Coates*)，關於英-葡兩國研究的哲學博士論文，2006年，頁65-79。

(20) 見克雷和福斯所著上述著作，頁269-273。

(21) 這個論題見阿姆斯特朗(T. E. Armstrong)所著《北部通路》(*The Northern Passages*)，收入潘寧頓編輯的上述著作，卷1：頁292-300。

(22) 根據收入奎恩編輯的《哈克路特手冊》的斯蒂爾所著《從哈克路特到珀切斯》一文(卷1：頁74-96)，哈克路特和珀切斯1613年相遇，後者在他的老師1616年去世後得到了他的文章。

(23) 見詹姆士·赫爾福斯(James P. Helfers)著《探險家還是朝聖者？現代批判觀點和理查德·哈克路特和珀切

斯的編輯方法》(*The Explorer or the Pilgrim? Modern Critical Opinion and the Editorial Methods of Richard Hakluyt and Samuel Purchas*)，《語文學研究》(*Studies in Philology*)，1997年春，卷1，第二期，頁160-187；帕米拉·內維爾·星盾(Pamella Neville-Sington)著《優秀傳播手：理查德·哈克路特和海外擴張政治》('A Very Good Trumpet': Richard Hakluyt and the Politics of Overseas Expansion)，塞德里克·布朗(Cedric Brown)和亞瑟·瑪洛迪(Arthur F. Marotti)編輯的《早期現代英國的文件和文化交換》(*Texts and Cultural Change in Early Modern England*)，頁66-79頁，克利伯(T. J. Cribb)著《完整日志：哈克路特的遺產》(*Writing Up the Log: The Legacy of Hakluyt*)，史蒂夫·克拉克(Steve Clark)著《遊記寫作和帝國：轉變中的後殖民地理論》(*Travel Writing and Empire: Postcolonial Theory in Transit*)，頁100-112。

- (24) “遠遊者”中對伊比利亞傳教工作和宗教儀式/準則/生活的展示見卷1：頁312-314、頁362-365、頁403-485。
- (25) 見第一章“論後期航海的改善和早年間發現世界的方式”(Of the improvement of Navigation in later Times, and the means whereby the World in her old Age hath beene more then ever discovered)，第二節：“亨利(Henry)是葡萄牙第一位國王約翰與英國女人生的第三個兒子，是位王子，也是後來的發現者：在探索過程中，父子都離經叛道，也接待了我們國家”。《遠遊者》卷2：頁9-15“(……)在英國商人的幫助下占領了休達(Ceuta)”。和該節題目所說的相反，亨利不是那個葡萄牙國王的第三個兒子，而是第五個；事實上，他是已經長大成人的約翰四世的第三個兒子。
- (26) 路易斯·德·賈梅士(Luís de Camões)，《葡國魂》(*Os Lusíadas*)卷4，頁50。
- (27) 哈克路特已經發表了菲齊(Fitch)和弗雷德裡克(Frederici)的報告(見普伽的《葡萄牙人的發現》頁85-91)。
- (28) 關於俄斐十六和十七世紀在亞洲的不同位置見托馬斯·蘇阿雷茲(Thomas Suárez)著的《東南亞早期地圖》(*Early Mapping of Southeast Asia*)，頁71-72。
- (29) 見卡羅爾·厄尼斯著《作為編輯的珀切斯》，收入潘寧頓編輯的上述著作，卷1，頁127。
- (30) 文章中提到航海家亨利·哥倫布在葡萄牙的模仿者約翰國王二世、曼紐爾一世、達伽馬(Vasco da Gama)、東印度群島的發現、巴西的發現和瑪加爾哈斯(Magalhães)、德雷克爵士(Sir Francis Drake)和卡文迪什(Thomas Cavendish)的環球旅行等。
- (31) 關於葡萄牙人對 Liefde 號到達日本的描述，見迪奧戈·古托(Diogo do Couto)著《印度歷史上十年的五本書》(*Cinco Livros da Decada Doze da Historia da India*)，第五冊，第二章，頁215-218。另見薩托爵士(Sir Ernest M. Satow)為夏瑞思(John Saris)的《夏瑞思船長日本之行1613》(*The Voyage of Captain John*

- Saris to Japan, 1613) 所寫的“引言”，頁1-36，帕斯克-史密斯 (M. Paske-Smith) 著《德川時代在日本和臺灣的西方人1603-1868年》(Western Barbarians in Japan and Formosa in Tokugawa Days, 1603-1868)，頁24-64。關於葡萄牙人的到來對日本耶穌會士在日本的活動的影響見科斯塔 (João Paulo Oliveira e Costa) 所著的《耶穌會士與新教徒在日本》(Os Jesuítas e a chegada dos Protestantes ao Japão)，文化雜誌外文版，第11期，2004年7月，頁35-47。關於早期對日本的描述見拉克 (F. Lach) 的上述著作，頁652。
- (32) 這在英語信息源中是用來特指每年往來於澳門和日本進行貿易的黑船的措施。(參照《費蘭多 (Firando) 的考克斯 (R. Cocks)，1615年12月6日寫給帕塔尼亞 (Patania) 的亞當·登頓 (Adam Denton) 的信中的註釋》，收入彼得·普拉特 (Peter Pratt) 編輯的《摘自英國東印度群島記錄的日本歷史》(Os Jesuítas e a chegada dos Protestantes ao Japão) 卷1，頁153)。
- (33) 關於中國早期對荷蘭人(紅毛魔)的出現和進攻澳門的記述見金國平和吳志良所著的《中國人眼中的三個海上火槍手》(Os Três Mosqueteiros marítimos vistos pelos Chineses)，文化雜誌外文版，第11期，2004年7月，頁168-170。
- (34) 夏瑞思日記《英國人赴日本首航》(The First Voyage of the English to Japan) 提到“澳門船”(144頁)/澳門船(220頁)，還提到葡萄牙耶穌會士的活動(149頁)。
- (35) 在文章空白處(卷3，頁537)編者告訴讀者：“葡萄牙人的澳門靠近中國大陸”。
- (36) 邁克爾·庫珀著 (Michael Cooper) 《在日本的第二個英國人：理查德·庫卡斯面對的考驗和艱難 (1613-1624年)》”(The Second Englishman in Japan: The Trials and Travails of Richard Cocks, 1613-1624)，《日本亞洲社會報》(The Transactions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Japan) 系列3，卷17，頁121-122。考克斯傳記，同上，頁128-129，德雷克·馬薩雷拉 (Derek Massarella) 著《理查德·考克斯早期生涯 (1566-1624)，英國東印度公司在日本商站的領導人 (1613-1623)》(The Early Career of Richard Cocks (1566-1624), Head of the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s Factory in Japan (1613-1623)，《日本亞洲社會報》，系列3，卷20，頁1-46。在第一頁，馬薩雷拉說，考克斯著名的日記是“研究東印度公司十七世紀初葉與日本建立直接貿易關係簡要嘗試的最重要的信息源之一”。“日記”(Diary)是“關於英國人貿易活動(……)信息的豐富寶庫”。
- (37) 關於葡萄牙人在日本的出現、英國和荷蘭人抵達日本以及英國在日本建廠，見德雷克·馬薩雷斯著《別處的世界：十六和十七世紀歐洲人與日本的相遇》(A World Elsewhere: Europe's Encounter with Japan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第八章(頁329-334頁)，該章記述了十七世紀英國對平戶商站和其對日本的瞭解。
- (38) 《在平戶的理查德·考克斯致倫敦的東印度公司》(Richard Cocks at Hirado to the East India Company in London (1st January 1617)) (1617年1月1日)，收入安東尼·法靈頓 (Anthony Farrington) 編輯的《日本的英國商站》(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1613-1623年，卷1，頁562和頁564。
- (39) 例如，見第29號文件(在平戶的理查德·考克斯1614年3月7日致在伊多 (Edo)、靜岡 (Shizuoka) 和其它地方的理查德·維克漢)，31號文件(“大阪 (Osaka) 的威廉·伊頓 (William Eaton)，1614年3月22日致伊多、靜岡和其它地方的理查德·維克漢”)，同上，頁138和頁142，這些頁中英國人描述了他與果阿的葡萄牙人喬治·德羅伊特 (George Droit [Jorge Durois]) 的接觸和貿易。另見維爾德馬·考蒂侯 (Valdemar Coutinho) 所著的《葡萄牙人在日本的最後期》(O Fim da Presença Portuguesa no Japão)，頁33-34。
- (40) 即平戶和長崎中國社區首領李坦(或“Andrea Dittis”/“中國船長”)和他的兩個兄弟，在長崎的華字(被英國人稱為 Whaw 或 Whow 船長)，另一個在中國(見文件第267號“平戶的理查德·考克斯1618年2月5日致在倫敦的托馬斯·史密斯和東印度公司”(Richard Cocks at Hirado to Sir Thomas Smythe and the East India Company in London, 15 February 1618))”收入安東尼·法靈頓編輯的上述著作，卷1：頁668)。
- (41) 文件第82號：“平戶的理查德·考克斯1614年12月10日致萬丹 (Bantam) 的約翰·約丹 (John Jourdain) (Richard Cocks at Hirado to John Jourdain at Bantam, 10 December 1614)”，同上，頁246。
- (42) 見文件編號為 75、83、84、85，同上，頁227、頁250、頁252、頁256-260。
- (43) 見科斯塔 (João Paulo Oliveira e Costa) 所著《基督教在日本和堂·路易斯·塞爾凱拉主教團》(O Cristianismo no Japão e o Episcopado de D. Luís Cerqueira) 卷2，哲學博士關於歷史的論文，新里斯本大學的 FCSH, 1998年，頁753-772。
- (44) 考克斯送往倫敦的一封信報告說“(……) 恐怕他們(荷蘭人)襲擊阿媽港的企圖會導致我們雙方都被趕出日本(……)。但是我們的中國朋友依然告訴我們可以把貿易做到中國去，祇要我們願意，已經獲得批准(……)。”同一年，日本要關閉商站已經有了跡象，這在12月10日從巴達維亞送到倫敦東印度公司董事們的一封信中已經看到了端倪(文件第357號)：“巴達維亞的理查德·福斯蘭德 (Richard Fursland)、托斯·布勞克頓 (Thoas Brockedon)、奧古斯丁·斯波爾丁和加百利·拖維森 (Gabriel Towerson) 致倫敦東印度公司 (Richard Fursland, Thoas Brockedon, Augustine Spalding, and Gabriel Towerson at Batavia to the East India Company in London)”，收入安東尼·法靈頓編輯的上述著作，卷2，頁867。

- (45) 文件第229號：“平戶的理查德·考克斯1617年1月1日和14日致倫敦的東印度公司（Richard Cocks at Hirado to the East India Company in London, 1 & 14 January 1617）”，同上，卷1，頁563。
- (46) 在東印度公司的記錄中提到的是他的受洗禮時的名字安德里亞·蒂迪斯（Andrea Dittis）和“中國船長”。
- (47) 文件第149號：“平戶的理查德·考克斯1616年2月25日致倫敦的東印度公司”。收入安東尼·法靈頓編輯的上述著作，頁381。
- (48) “平戶的理查德·考克斯1621年9月30日致在倫敦的托馬斯·史密斯和東印度公司”，同上，卷2，頁851-852。
- (49) 關於葡萄牙“印度國”歷史的不同階段，見路易斯·菲利浦·托馬斯（Luís Filipe Thomaz），參看〈印度國家〉（S. V. “Estado da Índia”），收入路易斯·阿爾布開克（Luís de Albuquerque）指導的《發現史辭典》（*Dicionário de História dos Descobrimentos*），卷1，頁388-395。
- (50) “接觸區”的概念是瑪麗·路易斯·普拉蒂（Mary Louise Pratt）在〈帝國的眼睛：遊記寫作和跨文化〉（*Imperial Eyes: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一文中提出的，頁6-7，是作為文化邊界的同義詞提出的，意為使原來在地理和歷史上分開的人們實現暫時的和空間上的融合。
- (51) 關於1629年10月弗洛比舍的妻子向東印度公司抱怨她在澳門居住情況的問題，見塞恩斯伯里（W. Noël Sainsbury）編輯的《政府文件、殖民地系列、東印度群島、中國和波斯一覽表（1625-1629年）》（*Calendar of State Papers, Colonial Series, East Indies, China and Persia, 1625-1629*）。文件第369號，頁256。
- (52) 彼得·蒙迪（Peter Mundy 1608-1667）著〈彼得·蒙迪的旅行〉（*The Travels of Peter Mundy (1608-1667)*）1907-1936年，卷3，頁141-142。另見英國圖書館、印度辦公室記錄（簡稱IOR）G/40/1, fls. 32, 60, “平戶的理查德·考克斯1621年9月30日致在倫敦的托馬斯·史密斯爵士和東印度公司”，收入安東尼·法靈頓編輯的上述著作卷2，頁854。
- (53) 關於果阿協定、早期英國人在澳門的出現和英-葡在澳門的關係，見普伽著〈（1635）果阿協定和（葡）英第一次澳門之行〉（*A Convenção de Goa (1635) e a primeira viagem (luso)inglesa a Macau*），《盎格魯-葡萄牙研究雜誌》，第14期，2005年，頁71-108，同上，〈澳門和中國的貿易：東印度公司在中國的常設機構〉（*Macau e o China Trade: O estabelecimento regular da East India Company na China*）《大西洋國：葡萄牙亞洲研究雜誌》（*Daxiyanguo: Revista Portuguesa de Estudos Asiáticos*），第8期，2005年9月2日，頁127-154，同上，〈英國最早的澳門之行（1635-1699）〉（*As Primeiras Viagens Inglesas a Macau (1635-1699)*）《海外歷史編年史》第6期，2005年，頁159-214。
- (54) 關於葡-荷在遠東的早期關係見諸如瑪利亞·曼紐拉·索布拉爾·布蘭克（Maria Manuela Sobral Blanco）所著〈荷蘭人和東方葡萄牙帝國〉（1595-1641年（*Os Holandeses e o Império Português do Oriente (1595-1641)*）），畢業論文，1974年；萊昂納多·布拉塞（Leonard Blussé）和維尼斯（G. Winius）所著的〈荷蘭人侵略“印度國”的起源和節奏（1601-1661）〉（*The Origin and Rhythm of Dutch Aggression against the Estado da Índia (1601-1661)*），收入索薩（Teotónio R. de Sousa）編輯的《印-葡歷史：老事件，新問題》（*Indo-Portuguese History: Old Issues, New Question*），頁73-83；萊昂納多·布拉塞著《在澳門的短兵相接》（*Brief Encounter at Macao*），《現代亞洲研究》卷22，第3期，1988年，頁647-664；恩斯特·範·維恩（Ernst van Veen）著，〈荷蘭東印度公司在遠東的戰略，1605-1640〉（*荷蘭東印度公司 Strategies in the Far East, 1605-1640*），《葡萄牙人快報/日本研究》，卷3，2001年12月，頁85-105。
- (55) 見里瓦拉（Joaquim Heliodoro da Cunha Rivara）編輯的《葡萄牙-東方檔案》（*Arquivo Portuguez - Oriental*），卷1，第二部分，頁113。另見瑪利亞·曼紐拉·索布拉爾·布蘭克所著〈荷蘭人和東方葡萄牙帝國（1595-1641）〉（*Os Holandeses e o Império Português do Oriente (1595-1641)*），頁114；洛瑞羅（Rui Manuel Loureiro）著〈沒有南部就沒有印度，葡萄牙人對荷蘭人到達東方的看法〉（*Sem Sul não há Índia. Impressões portuguesas da chegada dos holandeses ao Oriente*），《文化雜誌》外文版第12期，2004年10月，頁20。
- (56) 見查爾斯·博克瑟（Charles R. Boxer）著《1550-1770 貴族在遠東：澳門歷史的正史和野史》，（*Fidalgos in the Far East, (1550-1770): Fact and Fancy in the History of Macao*），頁50，彼得·伯斯奇博格（Peter Borschberg）著：《1603年聖卡塔琳娜（Santa Catarina）號事件：荷蘭海盜，印度的葡萄牙政體十七世紀初亞洲貿易》（*The Santa Catarina Incident of 1603: Dutch Freebooting, the Portuguese Estado da Índia and Intra-Asian Trade at the Dawn of the 17th Century*），《文化雜誌》外文版，第11期，2004年7月，頁13-25。
- (57) 馬丁·萊莉亞·範·艾特遜（Martine Julia Van Ittersum）著〈雨果·克勞迪士文章中的來龍去脈（Hugo Grotius）：范·西斯科克的聖卡塔琳娜的捕獲和法律訴訟中的辯解理由（1604-1606）〉（*Hugo Grotius in Context: Van Heemskerck's Capture of the Santa Catarina and its Justification in De Jure Praedae (1604-1606)*），收入《社會科學亞洲期刊》（*Asi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卷31，第3期，2003年9月，頁511-548。另見彼得·伯斯奇博格著〈對聖卡塔琳娜號被抓獲的重新審視：在亞洲的葡萄牙帝國，荷蘭東印度公司政治和荷蘭-柔佛聯盟的起源1602-1616年〉（*The Seizure of the Sta. Catarina*



- Revisited: The Portuguese Empire in Asia, VOC Politic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Dutch-Johor Alliance (1602-c. 1616)”, 收入《東南亞研究期刊》卷33, 2002年, 頁31-62。
- (58) 見馬內爾·奧萊(Manel Ollé)著《中國大業:從無敵艦隊到馬尼拉大帆船》(*La empresa de China: de la Armada Invencible al Galeón de Manila*)。
- (59) 見費爾南·格雷羅(Fernão Guerreiro)著《耶穌會神父傳教事務年報》(*Relação Anual das Coisas que Fizeram os Padres da Companhia de Jesus nas suas Missões*), 卷1, 頁236-237。
- (60) 見洛勒夫·洛勒夫茲(Roelof Roeloffs)的描述, 出版在《文化雜誌》外文版, 第12期, 2004年10月, 頁56-57, 查爾斯·鮑克瑟著 *Opera Minora*, 卷2, 2002年, 頁127-147。
- (61) 見雅克·考特(Jacques de Coutre)著《亞洲之旅》(*Andanzas asiáticas*), 頁156; 約翰·瑟多爾和約翰·伊斯雷爾·布雷著《次要航程》(法蘭克福, 1606出版)的第八卷, 艾薩克·科莫林著《荷蘭人旅行記述文集》(荷蘭東印度公司旅行的開始, 阿姆斯特丹, 1645) (*Begin ende Voortgang, van de Vereenighde Nederlandsche Geotroyeer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Amsterdam, 1645)第一卷, 這些文章在艦隊船長洛勒夫·洛勒夫茲的著作基礎上, 也描述了這個片段。
- (62) 見收入《文化雜誌》外文版中的馬蒂紐斯·阿匹斯(Martinus Apius)的文章, 第12期, 2004年10月, 頁61-67。他的描述與王臨亨著《粵劍篇》(*Swords Chronicle of Canton*)中描述相似。另見恩斯特·范·維恩所著《十七世紀荷蘭在南中國海的貿易和航行》(*Dutch Trade and Navig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during the 17th Century*), 收入《文化雜誌》外文版, 第11期, 2004年7月, 頁116-118。
- (63) 關於帕坦是荷蘭東印度公司與中國直接貿易的有用的起點問題, 同上, 頁118-120。
- (64) 見查爾斯·鮑克瑟《來自阿媽港的大船, 澳門和早期日本貿易編年史(1555-1640)》(*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 Annals of the Macao and Old Japan Trade, 1555-1640*), 頁67, 和《文化雜誌》外文版, 第12期, 2004年10月, 頁68-75。
- (65) 關於葡萄牙人早期在中國和澳門的出現和記述見洛瑞羅著《貴族、傳教士和中國官員: 19世紀的葡萄牙和中國》(*Fidalgos, Missionários e Mandarins: Portugal e a China no Século XXI*)。19, 馬內爾·奧萊(Manel Ollé)著《中國的發明、16世紀關於中國的認知和菲律賓戰略, XVI》(*La invención de China, percepciones y estrategias filipinas respecto a China durante el siglo XVI*), 和金國平、吳志良所著“澳門起源新探”。
- (66) 金尼閣將利瑪竇的“中國期刊”中的“基督教遠征中國史”(*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 apud Sinas*)翻譯成拉丁語, 1615年發表。
- (67) 關於前往日本的航程, 見文獻第379號: “在日本登船的約瑟夫·考克蘭姆致巴達維亞的理查德·福斯蘭(Richard Fursland)1623年1月7日(Joseph Cockram on board the Bull at Japan to Richard Fursland at Batavia, 7 January 1623)” 收入安東尼法靈頓的上述著作, 卷2, 頁922。
- (68) 參看文獻第364號: “平戶的理查德·考克斯致在巴達維亞的理查德·福斯蘭, 1622年9月7日” 同上, 頁891。另見文獻第365號: “平戶的約翰·奧斯特維克(John Osterwick)致巴達維亞的理查德·福斯蘭1622年9月7日”, 頁893-894, 文獻第366號: “平戶的理查德·考克斯致倫敦東印度公司的托馬斯·史密斯爵士1622年9月7日和11月14日”, 同上, 頁895-898。關於荷蘭人襲擊澳門的研究和資料來源見查爾斯·博克瑟(Charles R. Boxer)所著《16-18世紀澳門歷史研究》(*Estudos Para a História de Macau-Séculos XVI a XVIII*), 頁19-102, 帕特里扎·卡里奧特(Patrizia Carioti)著《東亞十七世紀初葉國際背景中的1622年荷蘭攻克澳門的嘗試》(*The 1622 Dutch Attempt to Conquer Macao in the International Context of Early Seventeenth-Century East Asia*), 《文化雜誌》外文版, 第15期, 2005年7月, 頁123-137, 和《文化雜誌》外文版, 第12期, 2004年10月, 頁89-115。
- (69) 見〈曼努埃爾·佩雷拉·達豐塞卡手稿: 關於1622年澳門打敗荷蘭人的捷報〉(*Relação da vitória, que a cidade de Macau teve dos holandeses no anno de mil e seycentos e vinte e doy, e que se acha com hum manuscrito de Manuel Pereira da Affonseca*), (海外歷史檔案館, 澳門, 第八箱, 文獻6)〈印度總督寫給葡萄牙國王的信, 1623年4月2日〉(葡萄牙國立東坡塔檔案館, 聖維森特文集編號19, 文獻156號), 和〈關於荷蘭人來犯中國港口澳門和總督卡爾瓦略獲大捷的簡報〉(*Breve relação da vinda dos Olandeses à cidade de Machao, porto da China, e da grande victoria que Lopo Sarmiento de Carvalho, capitão mor*), (查爾斯·博克瑟發表的: 阿爾瓦羅·多羅薩里奧修士, 〈1622年荷蘭人進攻澳門, 1622年荷蘭人進攻澳門〉(*Ataque dos Holandeses a Macau em 1622, Relação Inédita do P. Frei Álvaro do Rosário*), 38號, 頁17-30, 《殖民地總局公報》(*Boletim da Agência Geral das Colônias*)。英語資料來源也提到荷蘭艦隊戰敗、半數船員喪生的事件: 見諾爾·塞恩斯伯里(W. Noël Sainsbury)編輯的《國家文件、殖民地叢書、東印度群島、中國和日本列表1622-1624》(*Calendar of State Papers, Colonial Series, East Indies, China and Japan, 1622-1624*), 文獻第70號, 146, 頁31和頁65-66; “巴達維亞的福斯蘭主席1623年3月19日致[阿欽Achin]的喬治·羅賓遜(George Robinson) (President Fursland at Batavia to George Robinson [at Achin], March 19, 1623)”, 收入威廉·福斯特(Sir William Foster)編輯的《印度的英

- 國商站 (1622-1623)》(*The English Factories in India: 1622-1623*) 頁210; “巴達維亞的福斯藍主席和理事會致蘇特拉(Surat)商站, 1623年4月17日”, 同上, 頁225; “巴達維亞的福斯藍主席和理事會致[在普爾卡特(Pulcat)]的托馬斯·米爾斯及其公司(Thomas Mills & C.) 1623年4月17日(President Fursland and Council at Batavia to the Surat Factory, April 17, 1623)” 同上, 頁225-226, 和彼得·普拉特(Peter Pratt)編輯的《日本歷史》(*History of Japan*), 卷1, 頁446-447。
- (70) 關於1620年英-荷(針對亞洲的葡萄牙人)的防衛艦隊的形成, 見路德維格·雷斯(Ludwig Riess)著〈在平戶的英國商站歷史(1613-1622)〉(*History of the English Factory at Hirado (1613-1622)*), 《日本的亞洲文化社會會報》(*Transactions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Japan*), 卷26, 1898年, 頁86-101; 德雷克·馬薩雷拉(Derek Massarella)著《別處的世界》, 頁271-283; 瓦爾德瑪·考廷侯(Valdemar Coutinho)著, 上述著作, 頁109-110。
- (71) 見理查德·考克斯著《理查德·考克斯日記: 與1615-1622年在日本的英國商站的海角-商人的通信》(*Diary of Richard Cocks: Cape-Merchant in 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 1615-1622 with Correspondence*), 卷2, 頁332。
- (72) 見總督給葡萄牙國王王的信(葡萄牙國立東坡塔檔案館, 聖維森特文集, 編號19, 文獻154)。
- (73) 文獻第363號: “在平戶的約瑟夫·考克蘭姆致巴達維亞的理查德福斯藍, 1622年9月6日(Joseph Cockram at Hirado to Richard Fursland at Batavia, 6 September 1622)”, 收入安東尼·法靈頓編輯的上述著作, 卷2, 頁882-885。另見文獻第379號, “日本登船的約瑟夫·考克蘭姆致巴達維亞的理查德·福斯藍, 1623年1月7日” 同上, 頁922。
- (74) 另見〈紀念郭松濤〉(*Memorial of Guo Songtao*) (1865), 收入薩安東(António Vasconcelos de Saldanha)和金國平編輯的《呈皇上御覽: 清朝關於葡萄牙人在澳門定居的奏摺(1808-1887)》(*Para a Vista do Imperador: Memoriais da Dinastia Qing Sobre o Estabelecimento dos Portugueses em Macau (1808-1887)*), 頁117。
- (75) 見法雷·瑟巴斯蒂奧·曼里克(Frei Sebastião Manrique)著《塞巴斯蒂昂·曼里克的路綫》(*Itinerário de Sebastião Manrique*), 卷2, 頁144, 另見法雷·阿爾瓦羅·羅薩里奧(Frei Álvaro do Rosário)的記述, 〈1622年荷蘭人進攻澳門, 阿爾瓦羅·多羅薩里奧修士的未公開過的報告〉, 特別是17-18頁。
- (76) 見華西伯恩(W. E. Washburn)著〈當地人〉(*The Native Peoples*), 收入潘寧頓編輯的上述著作卷1, 頁167。
- (77) 參照斯凱爾頓(R. A. Skelton)著《探險家地圖: 地理發現的製圖資料記錄的章節》(*Explorers' Maps: Chapters in the Cartographic Record of Geographical Discovery*), 頁179。關於歐洲人的中國地圖, 見菲利普·本卡迪諾(Filippo Bencardino)著〈15-17世紀歐洲繪製的地圖上的中國〉(*La Cina nella Cartographia Europea dei Secoli XV-XVII*, *Revista de Cultura*), 《文化雜誌》外文版第33期, 2a系列, 1997年10月/12月, 頁9-30。
- (78) 見海倫·沃利斯(Helen Wallis)著〈珀切斯的地圖〉(*Purchas's Maps*), 收入潘寧頓的上述著作, 卷1, 頁154-155。
- (79) 見伯樂斯洛(Boleslaw Szcześniak)著〈十七世紀中國地圖: 歐洲製圖學編輯研究〉(*The Seventeenth Century Maps of China: An Inquiry into the Compilations of European Cartographers*), 《世界影像: 地圖學史國際期刊》(*Imago Mundi: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 第13期, 1956年, 頁124-126。
- (80) 見范·克雷(Edwin J. Van Kley)著〈十七世紀某歐洲清教徒對利瑪竇及其在中國的使命的反應〉(*Some Seventeenth Century European Protestant Responses to Matteo Ricci and his Mission to China*), 收入塞利亞·普拉皮利(Cyria K. Pullapilly)和範·克雷編輯的《亞洲和西方: 探險年代的遭遇和交換: 唐納德·拉克(Donald F. Lach)紀念文集》(*Asia and the West: Encounters and Exchanges from the Age of Exploration: Essays in Honour of Donald F. Lach*), 頁197-198, 頁202。
- (81) 見安東尼奧·約瑟·薩萊瓦(António José Saraiva)著, 《葡萄牙的歷史和文化》(*História da Cultura em Portugal*), 卷3, 頁424-444; 阿道夫·卡塞斯·曼特羅(Adolfo Casais Monteiro)著〈前言〉(*Prefácio*), 收入弗奧·門德斯·平托(Fernão Mendes Pinto)編輯的《遠遊記》的書頁, 頁7; 阿尼巴爾·平托·卡斯特羅(Aníbal Pinto Castro), 弗奧·門德斯·平托著《朝聖》寫的〈序言〉i-xlix頁; 詹姆·印索(Jaime do Inso)著《澳門生活的場景》(*Cenas da Vida de Macau*), 1997年, 頁37頁; 洛瑞羅: 〈《遠遊記》中的謊言和經歷》(*Mentira e experiência na Peregrinação*) 《文學藝術思想報》第167期, 1985年9月17日, 頁5; 同上, 《貴族》, 頁363-396, 頁647-673。
- (82) 見博克瑟(C. R. Boxer)編輯的《十六世紀的中國南部》(*South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頁344-345。
- (83) 見德里克·馬薩雷拉(Derek Massarella)著《別處的世界》, 頁334。
- (84) 關於英國人早期赴東印度群島和中國的航行, 即本杰明·伍德(Benjamin Wood, 1596)的遠航, 也是英國首次正式去中國遠征(雖然他率領的三艘船“熊號”、“Bear's Welp號”和本杰明號從來也沒有抵達目的地), 見英國圖書館 IOR, G/12/1, fl. 1, 亨利·考迪爾(Henri Cordier)《中國簡史和與外國的關係》(*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Chine et de ses relations avec les pays étrangers*), 卷2, 頁191-192。



- (85) 見埃達爾多·布拉扎奧 (Eduardo Brazão) 著《鄂本篤出使契丹記(1603-1607)》(*Em Demanda do Cataio: A Viagem de Bento de Goes à China (1603-1607)*)，另見亨利·於爾 (Henry Yule) 和亨利·考迪爾 (Henri Cordier) 編輯的《中國和通向那裡的路徑》(*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卷2，頁169-194。
- (86) 關於弗朗西斯·沙勿略(Francis Xavier)、范禮按(Valignano)和其他耶穌會士對遠東的精神征服，見《文化雜誌》外文版，第19期，2006年7月。
- (87) 見金國平和吳志良著《重溫澳門的起源》，頁28-30頁，頁45-95，頁186-187。
- (88) 關於這個問題，同上，頁155-178。
- (89) 關於龐迪我 (Diego de Pantoja) 的傳記細節 (瓦爾多摩羅 (Valdemoro)：1571-廣州：1618年) 見喬治·鄧恩(George H. Dunne)參見〈龐迪我〉(S. V. “Pantoja, Diego de”，收入卡靈頓·古德里奇 (L. Carrington Goodrich) 和趙穎芳(Chaoying Fang)編著的《明傳記辭典》(*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1368-1644*)，卷2，頁1116-1117。關於對其在中國經歷的研究和其信中對中國的描述見比特里茲·蒙克 (Beatriz Monc6) 著〈文化現實的描繪和構建：中國和龐迪我〉(Portrait and Construction of a Cultural Reality: China and Diego de Pantoja)，《文化雜誌》外文版，第22期，2007年4月，頁120-128。
- (90) 同上，頁121。
- (91) 艾薩克·伊斯拉爾 (Isaac D’Israeli) 著《文學珍品》(*Curiosities of Literature*)，頁108。
- (92) 見沙勿略·貝金·比勒考克 (Xavier Beguin-Billecocq) 著《亨利·菲尼斯 (1573-1647)，法國人首航遠東》(Henry de Feynes (1573-1647), le premier voyageur français en Extrême-Orient)，歷史學博士論文集，埃克斯-馬賽大學(Aix-Marseille)，1999年。
- (93) 參見博伊思·彭羅斯 (Boies Penrose) 著《文藝復興時期的旅行和發現1420-1620年》(*Travel and Discovery in the Renaissance, 1420-1620*)，頁309。亨利·於爾和波涅爾 (A. C. Burnell) 在《霍布森-約布森：英-印口語詞和詞組詞匯表》(*Hobson-Jobson: A Glossary of Colloquial Anglo-Indian Words and Phrases*)，頁33中認為這是一本毫無價值的書。
- (94) 關於澳門和廣州早期商業關係，見喬治·曼紐爾·佛羅雷斯 (Jorge Manuel Flores) 著〈澳門：歡愉時刻〉(Macau: O tempo da euforia)，收入奧利維拉·馬克斯 (A. H. de Oliveira Marques) 編著的《葡萄牙人在遠東的歷史》(*História dos Portugueses no Extremo Oriente*)，卷1，第2冊，頁201-205。
- (95) 關於郭居靜 (Lazzaro Cattaneo)，見卡靈頓·古德里奇 (L. Carrington Goodrich) 著，參照〈郭居靜〉，收入古德里奇和趙穎芳編著的上述著作，卷1，頁31-33。
- (96) 關於這個片段，見(中文)：金國平和吳志良著《綠島的歷史面貌，尋找被時光淹沒的澳門故事》(Some Historical Aspects of Green Island, Searching for Stories of Macau Erased by Time)，頁305-323。
- (97) 摘自古德里奇的危機摘要同上，頁32-33。
- (98) 見保羅·貴諾特 (Paulo Guinote) 和其他人所著《16-17世紀印度航綫上的海難及其損失》(*Naufraágios e Outras Perdas da “Carrreira da Índia” Séculos XVI e XVII*)，頁87和普伽著《葡萄牙人的發現》，頁96-98。羅素·彌爾(Russell Miller)，《航海家：東印度群島人》，頁8-9) 描述了截獲“聖母號 (Madre de Dios)” 船的情景：“1592年當“聖母號”拋錨時，英國的達特默斯 (Dartmouth) 港一片嘈雜 (……)。這是伊麗莎白時代英國見過的最大的船，就像一座流動的城堡 (……)，是英國最大的船的三倍。在達特默斯港，敏捷的水手們進行着交易，掠奪仍在繼續 (……)。掠奪來的寶物大部分歸於伊麗莎白女王；當她得知所發生的一切，便派遣沃爾特·拉雷爵士 (Sir Walter Raleigh) 從倫敦趕來尋回她的份額，懲戒掠奪者。‘拉雷發誓說，如果我遇到他們我會讓他們一無所有，因為女王陛下遭到搶劫，他們搶了她的最稀有的東西。’ (……) 對倫敦的商人來說，看一眼船上的貨物就使他們垂涎欲滴，如果能够打破葡萄牙人對東方貿易的壟斷，這些貨物就會是他們的。”
- (99) 見阿姆斯特朗 (T. E. Armstrong) 上述著作，頁300。
- (100) 見瑪格麗特·霍奇 (Margaret T. Hodgen) 著“十六、十七世紀的早期人類學 (*Early Anthropology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頁8。
- (101) 奈爾·福古森 (Niall Ferguson) 著《大帝國：英國如何創造了現代世界》(*Empire: How Britain Made the Modern World*)，頁23。
- (102) 見阿拉薩拉特南 (S. Arasaratnam) 著《東南亞》(*Southeast Asia*)，收入潘寧頓編輯的上述著作，卷1，頁256頁：“哈克路特的主要興趣在記錄(通過這個這個富有創造性的興趣)英國航海的發現和英國人在航海方面的優勢，而珀切斯對非歐洲世界的發現有全方位的興趣。”
- (103) 彼得·波希伯格 (Peter Borschberg) 著《1603年聖卡塔琳娜號 (Santa Catarina) 事件》(*The Santa Catarina Incident of 1603*)，頁14。
- (104) 參看羅德里克·普塔克 (Roderich Ptak) 著〈澳門經濟發展概要，約1557-1640年〉(An Outline of Macao’s Economic Development, circa 1557-1640)，收入蒂勒曼·格里姆 (Tilemann Grimm)、彼得·庫弗斯 (Peter M. Kuhfus) 和古德蘭·瓦克 (Gudrun Wacker) 編輯的《中國研究第19次大會文集》(*Collected Papers of the XXIXth Congress of Chinese Studies*)，頁171-172。

尚春雁譯